马克思主义学院
School of Marxism

党史案例集

（1919—1949）

序

为更好地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推动新时代思政课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教师开展了“四史案例集”编写工作。案例集按照历史节点顺序进行了编排，案例内容覆盖了“四史”的重大事件，每个案例包括事件的介绍、相关的案例、案例分析和教学建议四个部分。这些鲜活、丰富的案例将作为“四史”教育的重要支撑素材进课程、进教材、进头脑，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中，对于强化“四史”教育，坚定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引导学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党史案例集》编写组成员为贾鸽、贾晓璐、荣文秀、张淑君、许贵杰，《新中国史案例集》编写组成员为尹航、田然、李钰、董天歌，《改革开放史案例集》编写组成员为杨贺、何慧琳、宋永红、王琳、杨宇、张保光，《社会主义发展史案例集》编写组成员为常宏梅、高国伦、付霞、陈珊、贾鸽。在此对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由衷感谢！

案例集资料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共产党员网、新华网等网站以及著作、期刊论文、报纸等刊物，编写汇总整理过程中对所用资料作了部分调整，在此向有关机构、作者和资料提供者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本资料仅供内部交流使

用，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和不妥之处，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欢迎广大教师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目录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
1、五四运动 1
2、中共一大 5
3、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5
4、中共二大 12
二、大革命时期 16
5、中共三大 16
6、第一次国共合作 20
7、中共四大 24
8、五卅运动 28
9、北伐战争 32
10、中共五大 35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38
11、南昌起义 38
12、八七会议 41
13、秋收起义 44
14、三湾改编 47
15、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50
16、广州起义 53
17、中共六大 56
18、古田会议 60
19、长征 63
20、遵义会议 66
21、“八一宣言” 69
22、“一二·九”运动 72
23、瓦窑堡会议 75
24、西安事变 78
四、全国抗日战争时期 80
25、洛川会议 81
26、平型关大捷 84
27、《论持久战》的发表 87
28、皖南事变 91
29、大生产运动 96
30、延安整风运动 99
31、土地改革运动 107
32、中共七大 110
五、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13
33、重庆谈判 113
34、三大战役 118
35、七届二中全会 122
36、渡江战役 125
3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27
38、开国大典 131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五四运动

（1）五四运动：在 1919 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这个由几个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界的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 6 月 5 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 20 多个省区、100 多个城市。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 6 月 10 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 月 28 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并且实现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2）案例

周恩来请愿被拘

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周恩来也有过一次被拘捕的经历。

1919 年 11 月 16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福州学生罢课抗议，天津学生也奋起响应。25 日，天津学生千余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12 月 10 日，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学生组成了新的学联，号召抵制日货。20 日，天津各界在南开操场召开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

会，当场烧掉十多卡车日货，并在会后组织游行。27 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并组织游行。

在群众抗议活动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决定镇压。1920 年 1 月 23 日，检查日货的 3 个学联调查员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到警察厅请愿又被警察殴打，马骏等 20 多名学生还被逮捕。25 日，杨以德下令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联，张贴布告说学联等是违法组织，以后再私行结社、搞屋外集会等，一律依法追究，决不姑息。他还下令警察拘捕了一些到商店检查日货的学生。杨以德的强硬之举把爱国进步学生和反动政府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个别学生运动领袖有些退缩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担任总指挥，于 1 月 29 日召集各学校学生五六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到省公署后，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 4 人以代表身份冲破警察拦截，直接闯入省公署。省公署惊慌失措，下令警察将周恩来等 4 人逮捕。随后，又下令警察袭击学生，导致学生 50 多人重伤。

周恩来被拘捕后，表现得十分坚强、冷静。他和被拘难友在“审讯”面前义正词严，痛斥杨以德和天津地方反动政府，还多次发起绝食斗争。当年一起参加斗争的学生凌勉之也被杨以德关进监狱。后来，他回忆了狱中的这段斗争经历：后来，杨以德把我们又转押到保安队的一间木棚子似的小屋里，日夜有人看守，不能和其他的人见面。警察厅规定，早晨 9 点是上厕所的时间，厕所一排有十几个格，木格的下面是通的，我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纸条，研究对策。在狱中，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积极开展斗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还设法和保安队士兵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20 年春节时，杨以德召集我们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你们吃饺子！”我们谁也不吃。周恩来同志站起来气愤地指责他，逼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并为大家争取到了在一起谈话、晒太阳和洗澡的权利。3 月初，外边学校已经开学，周恩来同志提出利用反动派强令复课的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表示：“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我们每人都开了一份长长的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儿开图书馆吗？”

后来，周恩来同志决定，如杨不答应立即公开审判的要求，我们就绝食。这

一要求被杨以德拒绝，我们就开始了绝食斗争，大家整日水米不进，到第三天时，嘴上都起了泡，全倒下来了。杨以德等人害怕出事，忙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吧！有问题可以解决。”周恩来说：“我们爱国无罪！你们非法逮捕，我们要求审判，不应长期关押。你们同意以上要求，我们就停止绝食，不然一定绝食到底！”杨以德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

这次被拘，是周恩来生平第一次被关进监狱，也让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和当时的爱国进步学生一样，开始了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的进一步探索和追求。周恩来同一起被关押的学生商议决定，在监狱里要坚持斗争，也要坚持学习和锻炼。他们每天早晨做体操，每天晚上开会讨论局势和交流学习心得。经过周恩来等人的斗争，监狱允许他们自由阅读书报。周恩来不光利用这个机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还和马千里、于方舟一起主办了监狱中的读书团，介绍各种新思潮。与读书团中其他人不同，周恩来主要负责宣传和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他深入、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中国的良方，中国只有学习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成为人民民主的国家。对此，他在后来形容为“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1920 年 7 月 17 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以“骚扰罪”判处周恩来等人有期徒刑两个月，判定日期恰好和周恩来等人被关押的日期相等。当天，法官宣布对他们“期满释放”。出狱后，周恩来继续组织领导觉悟社的活动。当时，由著名学者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发起的勤工俭学活动，已经在国内许多爱国进步学生中掀起热潮，许多爱国进步学生都赴欧洲学习，探寻救国真理，周恩来也有此意愿。社会名流严修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推荐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得到了张的支持。在严修和张伯苓的支持帮助下，周恩来成为南开大学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批学生。

1920 年 11 月 7 日，周恩来在上海登上了“波尔多斯”号邮船，与 197 名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踏上了前往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之路。

——摘编自霞飞：《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前后》，载《文史春秋》，2020 年第 5 期

（3）案例分析

1919 年 5 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成长起

来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也催生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总结斗争经验，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者，最终成长为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世纪伟人，周恩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周恩来同志更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身份是：为新中国成立和发展奉献一生的“总理”，本案例中从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代表的角度讲述周恩来同志在五四运动中被捕与抗争的经历，更直接地展示了五四运动时期北洋政府“内腐外困”的黑暗统治以及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残酷现实；进一步明确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探索新道路的必要性、紧迫性，更好地阐述“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一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五四运动的过程，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理解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2、中共一大

（1）中共一大：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条游船后来被称为“红船”。参加大会的有 12 名代表，他们来自 7 个地方，代表 50 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2）案例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后四句有不同版本）“南陈”就是陈独秀，“北李”就是李大钊。

1920 年初，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护送他出京，在途中共商建党大计，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0 年 2 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经天津转赴上海。为躲避反动警察的追踪盘问，他们没有坐火车，而是化妆成下乡讨账的商人，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坐在车里，李大钊坐在车外，沿途都是由李大钊出面应付。这样，一连走了几天才到天津。路上，李大钊就和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李大钊等人在北京酝酿建党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根据目前所知，李大钊是最早与苏联及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从 1919 年夏秋到 1920 年 4 月前，李大钊先后会见了布尔特曼、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商讨了有关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1920 年 4 月至 5 月间，负有共产国际使命的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李大钊组织欢迎会、讲演会，予以热情接待，并邀集进步人士举行座谈。李大钊与维经斯基深夜长谈，对筹建中国共产党一事取得了一致意见。为了尽快在中国建党，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

5 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开始筹建党的组织。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答复：“就叫共产党！”8 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推举陈独秀为书记。10 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小组也成立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1 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支部建立后，陆续发展党员，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成员已有 11 人。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商讨。然后，李大钊派人陪同马林去上海与李达、李维汉等商讨，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反动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党的这次秘密会议。陈独秀作为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为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的经费不能离开，辞职尚未获准，也没有出席这次大会。7 月 23，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8 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李大钊研究文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3）案例分析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的道路，开启了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征程。

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给在黑暗中不断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案例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通过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逐步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组织条件，此外，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二节“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部分的辅助教学，通过案例带领同学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艰难却不懈的探索，以及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深刻感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心怀国家和人民，不怕牺牲、勇于抗争，坚定理想、不断探索的革命精神。

3、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 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罢工到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在 13 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包括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 100 余次，参加者在 30 万人以上。其中，1922 年香港海员罢工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

（2）案例

红色热土·英雄城市·永载史册

——武汉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深情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武汉是一方红色热土，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是当时国内外 8 个重要早期组织之一，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块重要基石。党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兴起，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其影响震动神州大地。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曾高度评价说：“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武汉地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切实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创建共产党组织的实践活动。1920 年夏，董必武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的来信，获悉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情况。上海党组织要求董必武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在复信中同意立即开始建党活动。此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为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是年六七月间，董必武与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等在武汉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地址在武昌抚院街三号。会议讨论了如何在武汉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制定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重要贡献，逐步形成了由研究会、武汉中学和革命刊物三位一体的坚强阵地，探索出以党领团、党团结合的组织发展途径。1920 年 3 月，董必武在武昌涵三宫街（现为武昌区粮道街 297 号）一所简陋的小院创办了武汉中学。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书刊；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灌输革命思想。

在董必武努力下，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都有武汉中学毕业生参加。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 10 位领导人中，就有 5 位毕业于武汉中学。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陈潭秋等经常在研究会报告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体会。为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思想报道，促进武汉人民觉醒，团结武汉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伟大斗争锤炼了革命骨干，到 1921 年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到 9 名成员。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1920 年 11 月 7 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成立。在武汉党组织的多方努力下，湖北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即开始深入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提高了武汉工人阶级的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党的一大召开后，董必武、陈

潭秋从上海回到武汉，主持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并迅速成立了先后以包惠僧、林育南为书记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壮阔场景。1921 年 10 月，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罢工，随后，英美烟厂、湘鄂印刷厂、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相继罢工，到 1922 年 10 月，湖北党组织在武汉先后成立 30 多个工会，宣布成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一波强劲的武汉工人罢工浪潮席卷而来，其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全国极为少见，并最终引发了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拟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各界代表 160 余人前往郑州参会。此时，一直标榜“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撕掉了面具，突然下令禁止大会举行，并派出大批军警阻止代表入场。愤怒的参会代表冲破阻挡，进入会场宣布按计划举行会议，庄严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2 月 4 日，汉口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随着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一声令下，江岸机器厂罢工的汽笛长鸣，仅仅几个小时，京汉铁路全线 20000 多名工人相继全体罢工，平日川流不息、往来繁忙的京汉铁路陷入瘫痪，犹如一条巨大僵硬的死蛇，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极大恐慌。吴佩孚恼羞成怒，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采取严厉的武力镇压。面对白色恐怖，武汉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绝不屈服。工人纠察队员以木棍、铁棒与军警展开肉搏，30 多名工人牺牲。林祥谦被捕后，被凶残的刽子手连砍 3 刀，忍着剧痛怒吼：“头可断，工不可复。”最后壮烈就义。面对军警的枪口，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慷慨陈词：“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鬼，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凛然正气，青史永存。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的顶峰。

——摘编自郑永红、吴翔：《红色热土·英雄城市·永载史册》，载《党史国史》，2020 年第 5 版

（3）案例分析

武汉作为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的重点区域，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再一次取得了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再一次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责任和使命，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成果，取得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个又一个胜利。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即开始深入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提高了武汉工人阶级的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全新的局面。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准备工作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准备了充足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使得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不仅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还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部分的辅助教学，掌握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发生的背景、条件和意义，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不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并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4、中共二大

（1）中共二大：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12 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 195 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 8 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在当前阶段党的最低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并分析以往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地发动群众，于时决定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就国共合作的方式进行讨论，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

（2）案例

朱德同志第一次申请入党被拒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现静安区老成都北里 7 弄 30 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党章，共六章二十九条。该党章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主要是为了从组织制度上保证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因此，入党时，须有党员介绍，并要经过逐级上报的审查手续。这对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是十分必要的。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员的质量标志着党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降低质量去追求数量，只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出积极发展党员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质量问题。朱德入党的事情就是一例。

1922 年 7 月初，朱德走出北平前门火车站，他雇了辆人力车，找到宣武门（旧称顺治门）外的方壶斋胡同一所宅院。朱德的到来，使孙炳文欣喜万分，赶紧将朱德让进屋里。寒暄过后，他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烜介绍给朱德。坐定后，孙炳文告诉朱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贫苦大众利益的，孙炳文说，这个党的党纲就是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华，号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听后，当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很不巧，他们赶到李大钊那儿，门上挂着锁，李大钊到南方去了。孙炳文说，我们要到欧洲去勤工俭学，要从上海走，我们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上海，孙中山和陈独秀分别接见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滇军名将。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今天的香山路 7 号）接见了朱德。这时，孙中山由于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正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他打算借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因此，希望朱德等能够重返滇军，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10 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于时便以要到欧洲求学为名拒绝了孙大总统的邀请。

8 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和孙炳文来到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了令人心生崇敬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朱德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来寻找共产党、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当陈独秀得知朱德是滇军旅长时，脸色骤变，他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与国民党不同，不是申请一下或者经人劝说就可以加入的，我们现在发展党员，都是在一起共事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考验认为合格才发展的，共产党党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斗争的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应该是长时间的。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身份，还是回到旧的军队去起积极的作用比较好，站在国民党那儿帮助革命也是一种办法吗，何必非要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中来呢？”陈独秀掀茶盖端茶碗喝了一口茶，示意朱德喝茶，朱德吃了一惊，显然，这是送客的姿态，就这样，朱德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直接被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拒绝了。受此冷遇，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信念最终没有动摇。

1922 年 9 月的上海，阴雨连绵。法国籍邮轮“安吉尔斯”号汽笛一声长鸣，缓缓离开上海，驶向遥远的大洋彼岸。朱德望着茫茫大海，对孙炳文说：“我有信心向共产党靠拢，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毫无抱怨地坚持走下去，我要经受考验，一次又一次地争取，争取成为这个先进组织的一分子。”

孙炳文说：“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是张申府，是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现在应华法教育会之聘到法国出任大学教授，他在法国已经先后发展了同船去法国的天津的刘清扬、周恩来入党。听说，周恩来现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到那儿，要先想办法找到张申府或周恩来等，可以向他们直接提出入党的要求！”

11 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作为朱德、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朱德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

——摘编自马萱：《中共二大与第一部<中共共产党章程>》，载《中共档案报》，2017 年 3 月 10 日

（3）案例分析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会议上通过的我党第一部正式党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朱德同志第一次申请入党被拒绝时，陈独秀同志说“你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体现了中共二大会议上关于党的建设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这些规定表明，党在初创时期，就非常重视要求保持党员的先进性。也体现了《中共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朱德同志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坚持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对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坚定选择。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部分的辅助教学，通过案例引导同学们了解中共二大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掌握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到群众中去的起点”，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深刻理解中共二大提出的有关“群众党”的决议影响深远，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大革命时期

5、中共三大

（1）中共三大：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 31 号（现恤孤院路 3 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 30 余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 420 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并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做出了正式的决定。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大会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召开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北伐战迅速推进；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涨；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更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严重的打击。

（2）案例

中共“三大”必不可少的代表——张太雷

1923 年 5 月，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带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要求中共立即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提议尽快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随后，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1923 年 4 月底，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广州新河浦路春园 24 号，张太雷也同时到达广州，并与马林、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等一起住在春园，开始着手中共 “三大”的筹备工作。张太雷负责大会文件以及决议草案的起草和组织工作。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也就是

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出席会议代表共 30 余人。张太雷作为中共“三大”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兼助手出席了大会。1923 年 6 月 12 日上午，先由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下午，马林用英文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国际工运问题》的报告，由张太雷现场翻译成中文。“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开会以前就在党内有过酝酿，共产国际也作过指示”，但会议代表就此问题依然争论热烈，张太雷“在会上发言很激烈，主张国共合作”。大体上，“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会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关于联合战线问题。张太雷、马林、瞿秋白、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同国民党联合即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人则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其次，国共合作后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问题。这是会议争论的主要问题，虽然该问题已在西湖会议上作了决定，但在理论上并没有确定。张太雷、马林、瞿秋白等人认为：“目前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 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人则认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再次，共产党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发言认为，我们党员不多，力量不强，工人没有文化，觉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没有革命理论，甚至污蔑工人有流氓习气。所以他主张要在国民党里去发展共产党，可以暂时不要共产党的独立工作，整个党参加到国民党那里去，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张太雷则极力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但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则“反对国共合作，尤其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他们只要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合，就可以完成中国的革命。”

最后，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太雷、马林认为：“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则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去”，要工人加入国民党，就是取消共产党的存在。

从会议争论的四个问题可以看出，中共“三大”期间，自始至终支持马林“党

内合作”方式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太雷，一个是张太雷在苏联期间介绍入党的瞿秋白。“在这次争论之中，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个是支持马林的。他们在代表中展开活动，宣传马林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宜违抗这训令。”中共“三大”期间，马林将会议代表意见集中整理后，用英文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再由张太雷、瞿秋白把英文打印稿翻译成中文，再发给参会代表进行讨论。大会经过反复讨论后，经马林、张太雷的积极努力，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包括产业工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并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至此，国共联合战线策略正式确立。此外，中共“三大”期间，张太雷分工负责草拟《青年运动决议案》，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的修改工作。1923 年 6 月 20 日会议结束的当天，全体参会代表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由张太雷、瞿秋白教唱《国际歌》。

——摘编自苗体君：《张太雷成为中共“三大”代表原因探析》，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12 期

（3）案例分析

中共三大会议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并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做出了正式的决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共“三大”前，张太雷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个自始至终支持马林“党内合作”政策的人。在中共“三大”上，关于是否与国民党合作、以什么形式合作，参会代表发生争执时，张太雷、瞿秋白两人协助马林做了不少工作，连一向傲慢的马林也盛赞张太雷“能干、可靠”。张太雷与瞿秋白是常州同乡，同时张太雷又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二人都有留苏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经历，而且二人关系密切，他们共同支持马林，并向其他代表做工作，才最终使得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得以通过。所以说，张太雷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集体抵制“党内合作”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三大”必不可少的代表。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部

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同学们掌握中共三大讨论的焦点 “国共合作的方式”的具体情况，对中共三大的内容和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并进一步理解当时条件下开展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6、第一次国共合作

（1）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3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大革命的准备与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2）案例

关于孙中山“北上”的争论

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 月，北方局势巨变。冯玉祥发动政变，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推翻了由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首领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进而控制天津地区。直系军阀溃败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冯玉祥立足不稳，奉系军阀已集结兵力进入北京、天津地区，伺机而动。段祺瑞乘势而起，重整旗鼓。北方又为军阀所控制，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孙中山为国家前途计，发表了《北上宣言》，决定仍应邀北上，到北京与各方商讨召集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事宜。

远离革命大本营的上海中共中央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决定，陈独秀、蔡和森、

彭述之都持反对态度。各地方党组织的相当一部分同志也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这是孙中山在寻求与军阀妥协。持这种观点的以中共北平区委书记赵世炎为代表。赵世炎认为，搞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等于国民党抛弃了国共合作政策，而去与军阀妥协。现在，中国共产党应当整个地反对国民党。但是，李大钊对孙中山北上持支持态度，当时由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支持孙中山北上，以扩大革命宣传，以鼓动全国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假面具。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都认为，虽然孙中山北上会处于军阀和列强的包围之中，但这个风险值得冒。毕竟孙中山应该走出广州，为国家统一而斗争，才能真正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所改变。

国民党中的右派则从另一角度支持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孙中山与统治北方的军阀合作反对直系，是当前的政治主题，而国共合作则不是主要的。同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团，右派依然持否定态度。而国民党中的左派则对孙中山北上持保留态度。一时之间，共产党内反对孙中山北上，甚至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日趋严重，他们同时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对立。

在北京地区一次党员会议上，赵世炎公开讲了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意见，但李大钊本着有利于国共合作，有利于大革命的全盘考虑，仍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共产国际和俄共也表明支持孙中山北上。鉴于社会上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进步人士也很多，且孙中山北上确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使北京地区的党员逐步转变了看法。于是，北京地区的党员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对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议题进行了表决通过。之后，北京地区党组织又在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中做了一系列说服工作。这些组织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意见。11 月 2 日，中共北方区委发表《檄告国民书》，对孙中山及他北上的决定进行了积极赞扬，并开始筹备迎接孙中山入京的事宜。同时，党组织对各民众团体发出号召：提前组建全国国民会议，以实际行动迎接孙中山先生。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 3 年，幼年时期的党组织即已勇于在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事件中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有的严肃与真诚。

孙中山注意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内的各种意见及其发展变化。他认为，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是革命，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自己不能留在广州坐失良机，

必须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11 月 13 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奔赴北方，他在赴北京途中发动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为支持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召集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得到了各地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人们纷纷表示拥护，这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冯玉祥虽欢迎孙中山北上商谈国家大计，但外国使团不承认冯玉祥控制的北京政府。而张作霖以绝对优势兵力进入北京地区后，冯玉祥的军队被迫撤回西北地区。冯玉祥在张作霖与段祺瑞联合压制下，也采取了疏远国民党的姿态。雪上加霜的是，孙中山出发之际身体状况已很差，加上舟车劳顿，他到达天津后，已经病重。而此时，段祺瑞已在张作霖、冯玉祥妥协下组成政府，宣布尊重对外条约，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并且推出了善后会议条例。这一切，实际上都已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排除在外。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行动上也更协调一致了。两党共同商讨时局和对策。

12 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铁路工会的十几名代表，组团到天津探望孙中山，代表们表示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向工人们表示谢意。不久，孙中山抱病进京，受到民众盛大欢迎。孙中山为了处理北方事务方便，指令北京国民党机关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要员参加，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被指定为会议成员。

当时，孙中山已经和段祺瑞决裂。孙中山对段祺瑞让步，但段祺瑞仍无视国民党的意见。革命立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揭露皖奉军阀的阴谋，帮助孙中山认清了形势。因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北上不仅没有陷于软弱与妥协，反而成为了一次坚定的革命行动。

在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国共两党除继续携起手来抗争，已别无选择。复杂的局势使国共合作得到了强化，两党的仁人志士摒弃成见，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奋进，继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这证明，在国民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期，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华大地上最诚挚的盟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1924 年的国共合作，在组织建设、军事武装的建立、群众运动的复兴、孙

中山北上，以及两党共同推动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当中，不断积聚着中华民族变革的能量，酝酿着一场历史巨变，也为掀起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浪潮奠定了基础。强烈的阳光，即将穿透翻腾的云海，照亮中华大地。

——摘编自陈思：《1924：求同存异承大义》，载《学习时报》，2019 年第 5 版

（3）案例分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战乱不息、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革命形势愈发严峻、民族的未来呈现出一片黯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本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共同理想，在双方互相协商、共同努力下达成的结果，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新局面，为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华儿女怀着改变民族未来的希望，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大革命的准备与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此后，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开展，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国共合作中有合作也有争论，关于孙中山是否“北上”的分歧即为典型代表：在争论中谋合作，在存异中求同，共谋民族复兴。在北方局势多变且远离革命大本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内都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声音，但是国共合作下，两党关于国家统一的理想需要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北上不仅没有陷于软弱与妥协，反而成为了一次坚定的革命行动，并推动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部分的辅助教学，带领学生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具体过程与形式，掌握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争论与成就，深刻理解开展国共合作对于当时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

7、中共四大

（1）中共四大：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民主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 20 人，代表着全国 994 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秘密会议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 14 项文件，大会还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2）案例

中国工人领袖邓培

邓培，1884 年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石湖洲村，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为我国工人运动，特别是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了无产阶

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中国职工运动过去的状况及现在的趋势，指明了今后职工运动的方向。在这次大会上，邓培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唐山的特派代表。

中共四大以后，邓培继续兼任唐山地委书记，在唐山地区贯彻中共四大决议，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工作中，他首先选派强有力的党员干部，深入到各重要厂矿，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先后在京奉唐山制造厂、启新洋灰厂、林西、赵各庄、马家沟各厂矿建立起党支部，党员人数也有很大的增长。同时，地委还加强了对学生、妇女、儿童等方面工作的领导。唐山交大建立了学生会，全市建立妇女协会，并组织一部分工人子弟，建立了市儿童团。在党的“四大”决议指引下，唐山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2 月 7 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41 人，邓培出席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中共中央给大会的祝词指出： “大会工友们竟以艰苦奋斗之结果，能在两年前惨遭巨变之同地同日，召集全国代表盛会，不胜欣幸之至”，并祝贺大会胜利召开。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京奉路唐山有四千多工人在组织了”。大会共开了 4 天，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显示了中国铁路工人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会上，邓培等 18 人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3 月 1 日，为了对抗段祺瑞提出的“善后会议”，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邓培以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5 月 1 日，邓培到广州，出席全国等二次劳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邓培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他在广州检查了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工会的工作。

“五卅”惨案发生后，邓培从广州返回唐山，领导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在车站广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紧接着，又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游行队伍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不给外国人当奴隶”等口号。群情激愤，呼声震天，住在唐山的帝国主义分子闻声丧胆，闭门不出。6 月，邓培再赴广州开展铁路工人运动。这时驻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搞军事叛乱，阴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邓培和广州工代会顾问杨殷、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刘尔崧等人，领导粤汉、广九、

广三、潮汕、宁阳（江门至台山）等铁路工人进行反抗杨、刘叛乱的斗争。他们组织工人拆藏火车头的重要零件，并把铁路工人集中到河南去，使铁路瘫痪；还从工人中挑选一批能干分子组成侦察队和宣传队，每天凌晨潜水渡过珠江，到对岸市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当周恩来等率领革命军要回师广州时，邓培等又组织工人迅速把火车头装好，分别开到东莞、清远、三水等地供革命军使用，帮助革命军迅速平定了杨、刘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这年冬，军阀孙传芳在黄浦江边秘密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军阀赵恒惕在长沙逮捕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对军阀的罪恶表示极大的愤慨，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上公开发表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最近上海孙传芳移密枪毙刘华、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汉口烟厂工人遭屠杀通电》，抗议反动军阀的罪行。后来，赵恒惕慑于群众和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刘少奇。邓培为此感到高兴。1925 年底，因为工作的需要，邓培被调到北京，专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摘编自叶文甫：《邓培：受列宁亲切接见的中国工人领袖》，载《工会信息》，2018 年第 16 期

（3）案例分析

中共四大在党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使全党的思想统一了起来，大会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中共从此开始追求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独立性日益增强。更为重要的是，会议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初步奠定了党的支部制度基础，为新时期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理论和组织基础。

中共四大之后，以邓培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工人教育，并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充分体现了四大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革命；邓培领导的工人运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进一步反映出中共四大的正确决策和方向，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部分的辅助教学，带领同学们掌握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理解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了解中共四大的召开对大革命高潮的重要影响。

8、五卅运动

（1）五卅运动：中共四大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1925 年 5 月 15 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 10 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25 年 5 月 30 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 2000 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 100 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 6 月 1 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1925 年 6 月 1 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2）案例

热血赤诚——听外公讲述五卅运动的故事

我的外公原名叫何志球，1925 年五卅运动时是当时同济大学共青团的负责人、上海学联委员。他晚年一直住在我家，多次跟我谈起当年带领同济大学的同学到南京路示威游行，经历了五卅惨案全过程的故事。

1925 年 5 月 15 日，上海发生了日资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领袖顾正红，并打伤数十名工人的流血事件。5 月 28 日，在青岛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镇压中国工人罢工的“青岛惨案”。屠杀事件接连发生，激起中国人民 的无比愤恨。中共中央发出 32 号通告，号召各地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内外棉工人的罢工斗争。5 月 28 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

上海区委召开会议,作出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 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 5 月 30 日在上海租界举行示威，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潮。

5 月 29 日，何秉彝与上海学联代表梅电龙来到同济大学，向何志球和尹景伊传达了上级组织的精神。何志球马上召集国民党区分部和学生会的骨干开会商讨，立即决定：当晚 7 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各委员分头到食堂、宿舍通知同学们，要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人人准时来开会。当天晚上,同济大学礼堂内外挤满了学生,由梅电龙同志报告顾正红惨遭日本资本家枪杀以来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动员大家坚决地投入到反帝斗争中去，要求同济大学的同学们同全市学生一道行动，第二天到租界南京路去示威、宣传、募捐，支援罢工工人。梅电龙慷慨激昂的报告，使全体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口号，争相上台演说，反帝情绪高涨。会议决定：1. 明日全体同学参加上海反帝示威大游行；2. 募捐支援罢工的工人；3. 全校组织 4 个中队，16 个小队，并推选陈宝骢、吴羹梅、尹景伊和袁文彬负责领队；4. 组织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何志球则负责与市学联的联系。5 月 30 日上午 7 时，同济大学 700 多学生群情激奋，整队到吴淞镇乘火车到市区。为了避免租界巡捕的注意和破坏，他们分批乘车,一支队伍在天通庵车站下车,经北四川路到南京路,另一支队伍在上海北站下车,经浙江路向南京路进发,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演讲，高呼口号。当游行队伍听闻有不少学生被巡捕抓走，在老闸巡捕房内关押了一百多人的消息，就纷纷向南京路云南路口靠拢，聚于老闸巡捕房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何志球忙于组织指挥同济各支游行队伍，这时也被巡捕抓进了老闸巡捕房，与十多个学生关在审讯室里。大家都没有胆怯，他们拍桌椅、打门窗、跟巡捕 讲道理。下午 3 时许，在外面游行示威学生的压力下，巡捕把关在办公室的人释放。何志球他们走出巡捕房，立刻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准备撤退时，发现捕房里面还关押有工人学生，大家愤怒地又涌向巡捕房,高呼口号,群情激奋,要求立即释放所有的工人学生。这时，三十名巡捕呈半圆形守在老闸巡捕房门口，每个人平端着枪指向游行的群众。3 时 45 分左右,英国捕头爱伏生下令开枪，旁边的 80 号印度巡捕首先射击，英、印巡捕一起朝人群开枪，游行队伍秩序大乱。何志球本来站在队伍前列，枪声响起时，人潮涌动，他被一辆黄包车绊倒，子弹射向他身后的尹景伊。何志球爬起来跳进巡捕房东侧的水果店中，回头望马路上，发现十多人倒在血泊中，其

中有认识的同济大学尹景伊、上海大学何秉彝等。

枪声停止后，何志球立即穿过南京路，从云南路飞奔到位于南市亚东医学校的上海学联，找到恽代英和其他同志，报告了南京路的伤亡情况，请示下一步行动。恽代英指示何志球，迅速收拢游行的同学回学校，明日继续来沪游行示威。何志球又回到南京路，找到吴羹梅、陈宝骢等带队的同学，要他们率同学们回校，他自己则留在上海学联与党、团组织联系。外公何志球回到学校，发现已被学校反动当局借故开除了，不能继续求学的他，被共青团上海区委 安排在吴淞镇平民学校做工人运动兼与同济大学的革命青年联络。1925 年 11 月底，共青团吴淞特别支部建立，何志球任书记。1926 年 1 月，共青团吴淞部委建立，何志球任书记，下辖 3 个支部，至 7 月，共青团吴淞部委发展为 6 个支部。1926 年春，何志球联络在同济大学的“五卅”学生骨干，发动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遭到军警镇压，吴羹梅、陈宝骢、袁文彬等大批进步学生遭到开除。经何志球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联系，五十多名遭开除的学生南下广州进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后来有的成了名医，有的参加北伐成为革命者。何志球也不能再在吴淞镇逗留，由共青团上海区委推荐，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批准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 年 4 月 11 日晚被国民党军警拘捕，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杭州陆军监狱坐牢 5 年，坚贞不屈受尽折磨。1932 年出狱后，到上海寻找组织未果，加上坐牢损伤了身体，在家里的催促下，回到湖南，后来抗战参加国军任军医，在鄂西石牌战役与日军战斗，抗战胜利后在湖南常德行医开办药房，解放后任常德市政协委员、工商联主席，1985 年去世。

五卅运动反帝风暴从 5 月中旬兴起,历经 6 月间的高潮期，然后逐渐低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对五卅运动进行围剿，北洋军阀政府强令各学校提前放假,学生离校,瓦解了学生的组织和团结。帝国主义用手段分化了中国资产阶级,使罢市的热情消失。最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对孤军奋战的上海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镇压。但是，五卅运动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在运动中得到迅速壮大。

——摘编自刘世炎：《热血赤诚——听外公讲述五卅运动的故事》，载《档案春秋》，2016 年第 5 期

（3）案例分析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 1925 年至 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何志球同志即为五卅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典型代表，他在五卅运动中的抗争经历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觉醒与英勇斗争，何志球同志在斗争中与党组织、团组织的密切联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的重要思想和组织指导作用。后期何志球同志加入黄埔军校以及“四·一二”中被捕充分体现了国共合作的开展与破裂带来的重要影响。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同学们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掌握全国范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共革命开展的重要指导，并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进一步理解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共合作破裂的巨大影响。

9、北伐战争

（1）北伐战争：1926 年至 1927 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约 10 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他们英勇善战，获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使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向前推进。西路军解放了湖南，攻克了湖北武汉；中路军解放了江西；东路军解放了福建。1927 年初，北伐军先后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当北伐军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党没有能够采取应付突发事变正确的措施。结果，蒋介石反动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新的军阀统治，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以失败告终。

（2）案例

周恩来对独立团北伐的指示

独立团奉命为北伐先遣队，首先开赴湖南前线。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由肇庆、新会出发，到达广州时，党派周恩来同志给独立团作指示。

周恩来同志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北伐的有利条件，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情况，唐生智部的情况，广东各军的情况，说明了党决定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任务。接着，他又着重地指示了下面几个问题：

1.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2. 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3. 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的与友军团结；

4. 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

5. 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

6. 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

周恩来同志最后还用“饮马长江”这句话鼓励大家。他临走时与每个同志一一握手，很有信心地说：“武汉见面。”

独立团党支部决定，把党的指示分别在党内和党外，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讨论，并决定以这个指示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南行军中的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每天利用行军中的休息时间和到达宿营地后的时间进行讨论。

从广州到韶关是乘火车走的。在火车里，大家很热烈地讨论这个指示。有些人说："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战争的经验总结。"有些人说："只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有些人说："有群众参加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没有群众参加的军事行动是军事投机，所以我们要注意发动群众。"有些人说："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解放中华民族，解救中国人民，什么都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可以牺牲。"有些人说："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这也是表现了党的作用。"……在整天的讨论中，全团干部和战士一致拥护这个指示，指示要坚决贯彻执行。

从乐昌出发那一天，要翻过广东、湖南交界五岭山脉的九峰山。五岭山脉是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九峰山是广东到湖南必经之路上最高的山。很多干部、战士都没有爬过这么高大的山，加以太阳炎热逼人，要爬过九峰山是有一些艰苦的。爬上几个山坡后，很多人已经汗水长流，出气短促，讲不出话来。爬上一个山坡，前面又出现一个更高的山坡，总是看不到山顶。很多人发愁翻不过这座山掉下队来，人家到了湖南前线自己还留在广东。部队中产生了很多不正常的情绪和疲劳现象。

叶挺同志看到这些情况，即下令休息一小时。休息时，以班为单位开讨论会，题目是"能不能吃苦耐劳？"战士们发言非常积极，到处都可以听见他们响亮的声音。有些人说："九峰山都害怕，子弹更会害怕。"有些人说："行军就掉队，打仗必落伍。"有些人说："爬山就怕苦，冲锋打不成。"有些人说："不能流汗的人一定不能流血。"有些人说："昨天是虎头，今天是蛇尾。"经过讨论后，原来走不动的人觉悟提高了。有的说："我能走了。"有的说："我绝不掉队。"

一小时过去了，继续向九峰山山顶行进。部队活跃起来了，一个跟着一个整整齐齐的象一条长蛇爬过九峰山顶。黄昏时到达宿营地，全团没有一个掉队。

——节选自周士第《北伐先锋》

（3）案例分析

本案例主要介绍了北伐战争期间，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北伐的有

利条件，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情况，唐生智部的情况，广东各军的情况后，对叶挺独立团的后期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独立团将周恩来同志的重要指示作为行军路上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全团干部和战士一致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叶挺独立团全体官兵无比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通过本案例，让学生了解北伐战争期间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刚归顺国民革命军而被吴佩孚部击败退守湖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叶挺作战北伐是国民党北伐的典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北伐战争过程中叶挺独立团的主要事迹，对北伐战争的战况作全面的介绍，也可结合共产党在北伐中做出的贡献等相关案例，引导学生学习北伐战争的发生背景、结果和意义等相关内容。

10、中共五大

（1）中共五大：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等 82 人，代表着 57900 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大会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2）案例

中共五大：担起挽救革命重任？

1924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1926 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继续维持其自身在华利益，纷纷寻找其在华的新代理人，而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随着羽翼渐丰势力不断扩大，逐渐走上了军事独裁的道路。

1926 年末至 1927 年初，随着革命重心的北移，广州国民政府发生了迁都之争。1927 年 3 月 20 日，国民政府正式由广州迁往武汉，革命中心随即转移到武汉。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如恽代英、彭湃、毛泽东、瞿秋白、刘少奇等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同原在湘、鄂、赣地区工作的董必武、方志敏等会合在一起，继续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而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已决意单干，分裂国共合作大业。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于 4 月 18 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国内局势迅速逆转，全国由此形

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这时的武汉政府虽然基本上还是革命政府，但内部情况日趋复杂，各种矛盾和危机相互交织。与此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其中中共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随即被杀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以挽救革命。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筹备五大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会前，已向全党发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上海、广东等地党组织认真讨论了此文件。对此，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这样记述：

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刻，1927 年初，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案所指的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等要点，“经过详细讨论和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并检讨了我党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所以，“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政治局确定今天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要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中央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和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国际决议的解释发至各区委、地委和特区讨论。……一致赞同国际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的解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国际决议所指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认为“现在是国民革命时期，不是社会革命工农专政时期”；分配土地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完全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需要，“农民运动绝不是超过国民革命的运动”；“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推翻封建阶级的最后胜利，是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

全党对共产国际决议的讨论，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五大召开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节选自沈传亮、李庆刚，《为了人民：话说历届党代会》，河北人民出版社，第 63-67 页

（3）案例分析

中共五大的召开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筹备中共五大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中共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措施，因而难以承担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通过此案例引导学生了解共产国际决议为中共五大的召开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从大革命的失败中，中国共产党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1、南昌起义

（1）南昌起义：1927 年 8 月 1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 2 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军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集军队包围南昌。8 月 5 日,起义军按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10 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随后，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到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于 1928 年 4 月下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它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8 月 1 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2）案例

南昌起义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的这一枪，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1926 年，北伐形势还一片大好，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于 1927 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忍屠杀大量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全国上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于水火，中共中央随即进行改组，停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决定联合部分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二次北伐。然而，中共在九江组织具体行动过程中，发现张发奎与汪精卫勾结紧密，并在其指挥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员。至此，共产党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实行暴动。

随后，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赴南昌发动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主要是国民革命军

第二方面军，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军和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的指挥下，陆陆续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挺进。27日，周恩来等人到达南昌，加紧领导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各队主力较为分散，而在南昌市及近郊，只有敌方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三千余人驻守。深入了解敌情后，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前委决定，趁敌方援兵未到，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按原计划进行。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则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在中共前委的得力督战下，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激战至拂晓，歼灭守军3000余人，缴获枪械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天下午，驻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也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发动起义，并于次日抵达南昌。

南昌起义大获全胜。随后，中共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仍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号召革命，并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与新旧军阀斗争的坚定决心。

2018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91周年，也是我国建军91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发表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参考习近平在2017年8月1日建军节90周年的讲话视频

（3）案例分析

本案例主要介绍了南昌起义发生的背景、基本过程、结果和重要意义。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致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教训，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之间的分界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开始，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的开端。8 月 1 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通过此案例，让学生了解南昌起义发生的背景、基本过程、结果和重要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结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理解南昌起义爆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南昌起义的学习，教师可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并结合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运动，从而使学生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深入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

12、八七会议

（1）八七会议：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0 人，候补中央委员 3 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 8 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遭受第一次严重挫折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的斗争。

（2）案例

“八七会议”

——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 年 8 月 7 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来、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 21 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也出席会议。会议主席李维汉，实际主持人瞿秋白。会议第一项议程，由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

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接着，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大会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顾顺章、彭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武昌起义打响之后，8月7日，在武汉——当时中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中共中央决定举行紧急会议。

在汉口原三教街41号的一座公寓式的房子门前，为了不引起满街反动军警和特务们的注意，中共中央内部交通员整整花了3天时间，才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以及邻近省份的党组织负责人共22人一个个带进公寓二楼会场。他们当中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蔡和森、毛泽东……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外，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前苏联人）罗明纳兹及其两个助手也参加了会议。

因为时局严峻异常，会议只开了一天，但这个会议却作出了关于中国命运的许多重要决定。会议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指明了共产党人必须靠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方向。

参加完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急匆匆赶回湖南。在他到达安源、铜鼓后，向当地和部队的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将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3个团），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渡为师长。

——节选自林之满、萧枫：《改变时局的世界会议（上）》，辽海出版社，第91-93页。

（3）案例分析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着重批评了大革

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毛泽东同志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状态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部分的辅助教学。八七会议紧跟南昌起义、上承北伐战争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共政变，下启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既是经验教训总结，也是理论思想准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时期。教师可通过案例引导学生了解当时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帮助学生理解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如何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13、秋收起义

（1）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湘赣两省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 1927 年秋收季节举行的武装起义。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湖南，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 月 18 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起义，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9 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军事部署问题。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有原武汉政府警卫团、安源革命武装和浏阳、平江的农军，约有 5000 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 4 个团。9 月 9 日，湘赣边界起义爆发。当天，起义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第一团在修水起义后，准备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被迫向浏阳方向转移。9 月 10 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相继攻克醴陵、浏阳，后在浏阳陷敌重围，损失大部。9 月 11 日，第三团由铜鼓西进，在攻占东门市后被敌人袭击。9 月 19 日，各路起义军退集到浏阳县文家市。毛泽东在此召集前委会议，讨论部队进军方向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向湘赣粤边的农村进军。会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南下，向井冈山进军。

（2）案例

西江月·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秋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蒋介石篡夺后，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结束了陈独秀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一到长沙，即制定暴动计划。8 月 30 日，他在湖南省委常委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9 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工农民众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设立前敌委员会。起义军由毛泽东任党代表，卢德铭为总指挥，计划配合各地工农武装分三路攻打长沙。第一路(二团)以安源工人为主力，进攻萍乡一带；第二路(一团)以卢德铭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从修水向平江进攻；第三路(三团)以浏阳农军为主力，亦由铜鼓向浏阳进发。9 月 9 日，毛、卢所组织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这支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挥动时，“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暴动的口号响彻山谷。

1927 年 9 月 11 日清晨，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一千多名战士，兵分三路，自铜鼓出发，向浏阳、铜鼓两县交界的重要村镇白沙镇进击。经过一场激战，仅用一个小时就大获全胜，于当晚攻占白沙镇。毛泽东十分高兴，说：“白沙之战是旗开得胜。”第二天，毛泽东率第三团又继续向东门市进发。一路上，看到自己的部队在迎风招展的军旗指引下，雄赳赳地向前挺进，毛泽东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填词一首《西江月·秋收暴动》这首革命暴动的赞美诗。此词写成后很快在起义部队中传开，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战斗意志。暴动受挫后，革命军在文家市集结。10 月，经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余部到达井冈山区，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时代。

毛泽东这首记述秋收起义的词，用韵有些特别，它未按词律每二、三、四句成韵，而是每阕二、三句同韵，上、下阕末句依湖南方言用“进”、“动”隔阕押韵。这也许是作者任其自然，不愿因韵伤意的缘故。这首词，最初在 1956 年 8 月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上刊载的谢觉哉《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一文中披露，题目为“秋收暴动”，其“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句，原为“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接着，1957 年 7 月号《解放军文艺》刊登的邓叙萍《读毛主席诗词的一点感受》一文再次披露了这首词。1986 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选》正式发表，题为《秋收起义》。这表明作者后来对此词作了修改。从总体上看，词的题目改得好，但将词中的“修铜”改为“匡庐”，

将“平浏”改为“潇湘”，这种修改反而有工绣气，有失原词本色。

——摘自胡为雄《毛泽东诗赋人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60-62 页。

（3）案例分析

失败和教训是通向成功之路。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后领导的又一次重要武装起义，也是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一次伟大创举。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这次起义中产生了第一支打出自己旗号的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且诞生了我军的第一面军旗。从这次起义开始，我党开始在农村开展了游击战争，保留下来的工农革命军，也成为后来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以通过此案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起义，以革命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是秋收起义的潜在意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三大起义结合起来分析，指出三大起义为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14、三湾改编

（1）三湾改编：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开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尤其是“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大创造，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根本制度。

（2）案例

三湾改编

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位于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北麓，是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小山村。但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率领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向萍乡、莲花、永新一带转移到达了三湾村。

9 月 30 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住的“泰和祥”杂货铺里召开了前敌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提出了“党建在连上”重大主张，当时担任师长的余洒度提出各种异疑，陈浩、徐韩等人也站出来反对，室内争论非常激烈，讨论异常，毛泽东耐心作解释，最后举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为例，把党支部建在团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党掌握了自己的军队的成功经验，来说明“党建在连上”，发挥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拖不垮、打不烂，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微弱的油灯下，会议一直讨论到天亮。

第三天清早(10 月 1 日)，师长余洒度召集部队在枫树坪下集合了，毛泽东

站出来讲话，首先鼓舞士气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当敌人100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毛泽东接着宣布“三湾改编”会议精神，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三项决定: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十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即，部队开始整编。

10月3日清晨，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集体在三湾村的枫树坪，毛泽东向部队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向井冈山进军的意义，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信心和意志，同时宣布了行军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等款要归公，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这就是后来对人民军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三大纪律的开端。随后，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下，部队离开三湾向原宁冈古城进军。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腹地——茨坪。此后，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建军原则，在整合袁文才、王佐的井冈山农民武装，朱德的南昌起义余部，毕占云和张威起义部队，彭德怀黄公略起义部队，季振同董振堂的宁都起义部队的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坚持，逐步提升了军队和军人素质，为建立打不垮的红一方面军积累了经验。

——摘自陈红《大学生党课教程》，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38-139页。

（3）案例分析

秋收起义失利后，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在思考如何把一支农民占多数的旧式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执行严格纪律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这个重要战略问题。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专门做党的工作，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员和士兵群众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纽带，使党成为党军

合一的武装实体，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组织，从而强化了对军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最终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此脱颖而出。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部分的辅助教学。通过此案例，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三湾改编的措施和重要意义等相关问题，帮助学生掌握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的先进性。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三湾改编确立的“党领导军队”基本思想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

15、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1928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10 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它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党内和红军内部有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全盛时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两县一部分，遂川县北部等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2）案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国民党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围剿。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合计损失 1000 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

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使林彪一直郁郁寡欢。1930 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毛泽东在回信中，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摘自苏原：《“星火燎原”诞生始末》，中国报道，2010 年第 1 期

（3）案例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大革命的失败，积极地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出路。是继续坚持进攻中心城市，还是向农村转移？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排除艰难险阻来到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个革命的火种时，争论再起。是进行流动的游击战，还是有稳固根据地的游击战?面对林彪等人的困惑，毛泽东再一次耐心解答，亲自给林彪回信，他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中国革命自身发展的独特的道路和战略策略。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与发展，毛泽东关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理论逐步成熟。事实证明，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之后发展成为了一片燎原之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以通过此案例，让学生了解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大背景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基本内容，引导学生掌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失败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型革命道路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相关内容，通过分组辩论的形式，得出中国革命选择“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进步性和重要意义。

16、广州起义

（1）广州起义：1927 年 12 月 11 日，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的武装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是由共产党控制和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共约 6000 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歼灭市中大部分守敌，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广州起义及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震惊了国民党新军阀，他们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反革命军队 5 万余人，在美、英、日帝国主义战舰炮火掩护下，大举反扑。起义军经过 3 天 3 夜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战士牺牲。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英勇反击，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起义的失败，证明在国民党新军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案例

广州起义

1926 年，在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影响与推动下，北伐革命战争犹如燎原烈火，从广州烧到南昌、武汉，烧遍了整个长江流域。但是，正当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却把枪口转向革命。不久，武汉的国民党也公开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合流。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正在这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举行的南昌起义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大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和方向。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转移，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

11 月 28 日，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建立了行动委员会和指挥部，张太雷同志任总指挥。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一些工人组织统一组成工人赤卫队，秘密地武装起来。赤卫队共编为 7 个联队，徐向前同志任第六联队的联队长。通过党的关系，还把大批党的军事干部和省港罢工工人秘密地派进警卫团，使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

叶剑英同志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是起义的主力部队。

12 月 7 日，行动委员会又秘密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 12 月 13 日举行起义。

12 月 11 日凌晨，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学员，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首先誓师起义。与此同时，分散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目标。警卫团也在解除了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士兵的武装后宣布起义。一个小时之后，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就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并在那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教导团的第二、第三两个营，乘黑夜分别袭击驻地邻近的敌步兵团和驻沙河的敌炮兵团，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各区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仅仅两个多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各马路都悬上了红布横额，写着“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反革命的张发奎、黄琪翔”等标语。

广州的武装起义，震惊了国内外的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英、美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起义部队一面在市内继续肃清残敌，一面抵抗外围敌人的进攻。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张太雷同志，参加西瓜园群众大会的归途中，在中华路黄黎巷附近，遭到敌人暗杀，使这次起义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绝不是消极的“退兵之一战”，而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为了挽救革命，为了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奋起领导革命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籽传播到广大农村，在毛主席光辉旗帜的指引下，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节选自《光辉的节日 深切的怀念：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7—210 页。（原载 1977 年 7 月 29 日《解放军报》，据新华社北京 1977 年 7 月 29 日电）

（3）案例分析

本案例讲述了广州起义的背景、经过和结果。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

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面对强大敌人向广州发起围攻，叶挺、叶剑英主张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但却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以将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讲解，要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尝试和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行对比，揭示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必要性。同时，要将以八七会议为代表的 1927 年一系列事件进行综合性讲解，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进步。

17、中共六大

（1）中共六大：1927 年党的五大闭幕不久，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镇压，以及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让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难以找到安全之处开会。不久，中共中央得知 1928 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经共产国际同意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 距莫斯科市中心约 40 公里的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 18 号）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42 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 84 人。为确保安全，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代表到达会场报到之日起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一律使用编号。

这是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用代号相互称呼姓名的大会。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决议案在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的同时，进一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决议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并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六大以后的两年， 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2）案例

周恩来夫妇赴莫斯科遇险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与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代表们的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1928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

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那是 1928 年 5 月初，周恩来夫妇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停靠大连码头，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他们携带的箱子里却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夫妇一生多次遇险，但这一次是刻骨铭心的，以至几十年后，邓颖超还能把细节回忆得这么清楚。

历时一个多月，到 6 月中旬，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摘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年 8 月

（3）案例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7 年 11 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快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最终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 年 4 月 2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 100 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案例中通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日本军警周旋，冲破重重险阻道道关卡，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五一村，参加中共六大的历险经过，说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严峻，不仅要躲避国民党的搜捕，还要应对日本军警的盘查，从侧面也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省势力的猖獗。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面临的严峻局势和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探索，了解中共六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18、古田会议

（1）古田会议：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廖氏宗祠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为"古田会议"。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开辟了思想建党的成功之路，形成了党的建设独特的政治优势。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党指挥枪"等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成功之路，铸造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奠定了中国特色军事制度的坚实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总结我军创建初期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制度和方法，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基础。

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初步回答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及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成为了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会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2）案例

古田会议精神的忠诚实践者——罗荣桓

1929 年 12 月初，红四军进驻福建闽西连城县新泉镇开展政治、军事整训。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全程参加了这些会议，积极反映了部队的许多情况。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红军必须“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使之成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12 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各种会议，协助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2 月 28 日至 29 日，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会上改选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罗荣桓当选为前委委员。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升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一到任，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部队的关键。

有些官兵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的手段，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种观点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被确定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的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正确的干部进行说服。他说：“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予批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他还指出：“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

为宣传、贯彻、执行古田会议精神，罗荣桓终身不遗余力，并且非常注重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忠诚地贯彻执行着古田会议精神。

——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2020 年 4 月 23 日

（3）案例分析

1927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罗荣桓便是起义队伍中一位戴着眼镜、学历最高的年轻党代表。三湾改编后，他成为我党最早的七个基层连队党代表之一，为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古田会议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时评价说：“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罗荣桓被称为“政工元帅”，军政皆能。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罗荣桓始终不遗余力地宣传、贯彻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灵魂”，堪称“古田会议精神的忠诚实践者，也终将一支成份复杂的农民武装建设成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红军铁军”。

1963 年 12 月罗荣桓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了罗荣桓的追悼会，深深地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的奠基人”之一的元帅三鞠

躬。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几天夜不能寐。一天深夜，毛泽东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和痛惜之情。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古田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意义。

19、长征

（1）长征：指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主力 8.6 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其后，1935 年 3 月、4 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长征。1935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1936 年 6 月组成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

在强渡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 3 万多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 年 10 月 19 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1 月初，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 年 10 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 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 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红军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

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2）案例

长征精神的“金字招牌”

80 年前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大转移。在这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远征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长征四老”，他们是红军中 4 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

长征开始时，这 4 位老同志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 50 岁。不仅年纪老，这 4 位同志的资格更老，徐特立曾经是毛泽东、蔡和森、田汉的老师，谢觉哉是清代最后一科秀才，林伯渠早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董必武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因此，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这 4 位都是声名显赫、名副其实的“老同志”。

在重兵围追、充满凄风苦雨的长征路上，这 4 位老同志却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而是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正因为这些老同志的率先垂范，给予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地鼓舞，可以说，“长征四老”就是长征精神的“金字招牌”。

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长征精神，在“长征四老”身上得到了生动诠释。徐特立虽然年龄最大，却常常将马让给生病体弱的战士和妇女同志；谢觉哉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便毫不犹豫起身出发；林伯渠不仅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还靠双脚走完两万五千里；董必武被喻为妇女队的“胡子队长”，妻子却在敌后开展地下斗争、从此生死不明。这些党的领导者、老同志，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 年 3 月 10 日 16:42:14

（3）案例分析

震动全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全新历史，也

绘就了中华民族全新的精神图谱。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突破腊子口、酣战吴起镇，红军战士用打不败、战不垮、苦不倒、累不死、誓夺胜利的革命精神,和以自己血肉之躯所铸造的长征历史,不仅使我们心灵震撼,而且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今天我们回望长征、弘扬长征精神，就是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长征四老”这块长征精神的“金字招牌”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理想信念是如何地坚持到底，如何地“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新的时期，新的征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续写长征精神的时代篇章，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就更要擦亮“长征四老”这块“金字招牌”，使其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了解长征和进一步理解并发扬长征精神。

20、遵义会议

（1）遵义会议：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一次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李德等 20 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博古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问题所做的总结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明确提出必须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2 月 5 日，中央红军从遵义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责。3 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党内最高军事指挥小组，即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取代了原来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团。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极其危急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案例

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

1935 年 1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时，我党和红军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于 1934 年 10 月被迫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突破敌人的湘江封锁线时，红军由出发时的 8 万多锐减到 3 万多名，损失惨重，士气十分低落，领导集团分歧严重，而敌人已调集 40 万军队，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形势十分严峻。12 月，红军进入湖南通道县，中央在这里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个主张得到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赞成。于是，红军立即由湖南进入贵州黎平县，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新的行动方针，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确定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的军事指

挥上的经验教训。

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因伤痛缠身，不能承担具体工作事务，但他仍然视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关注和思考如何摆脱困境，使红军转危为安。他觉察到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下决心来一个根本转变。在红军长征途中，王稼祥积极主动地做了许多工作。他首先与毛泽东沟通思想，向毛泽东倾吐了自己的担忧和疑虑。他说，如果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改变目前危急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接着，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泽东的观点，同张闻天交谈，取得了一致意见。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由于王稼祥的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为酝酿和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基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35 年 1 月红军进占遵义城，获得了短期休整的时机，于是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极力为自己与李德的错误辩解，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方面，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的集体意见。接着，毛泽东首先起来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失败教训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并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方向。这时，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此关键时刻，当毛泽东话音一落，王稼祥马上站起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郑重建议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并由毛泽东出来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由于王稼祥第一个出来明确而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接下去绝大多数同志相继支持毛泽东。在选举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王稼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中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历史事实证明，王稼祥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对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十年动乱”中，毛泽东又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陈毅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还曾作了生动的比喻：“稼祥同志好比楚汉之争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摘编自戴惠珍:《王稼祥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安徽史学》，1994 年第 1 期

（3）案例分析

遵义会议上的争论实质是坚持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与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要求克服这种错误倾向的观点之间争论。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路上的王稼祥因伤一直躺在担架上，却也因此有了和毛泽东相处的机会。长征开始时，毛泽东因大病初愈，加上当时因受排挤心情苦闷，因此身体非常虚弱，行路困难，所以出发时也躺在了担架上。这次同行，他们走一路谈一路，晚上还要一起宿营，这使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毛泽东，被毛泽东的学识谈吐、理论修养、对中国革命的深刻独到的见解、对革命发展的预测所吸引。王稼祥意识到，该是毛泽东“出山”的时候了。在征得周恩来、洛甫的支持后，王稼祥在毛泽东发言后，第一个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土地革命受挫的历史原因和转折的出现，理解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1、“八一宣言”

（1）“八一宣言”：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 月 1 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八一宣言》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2）案例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节选）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

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

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1935年8月1日王明等执笔

——摘编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3）案例分析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在东西方先后冒起，世界面临法西斯的进攻。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中国东北以后，1935年又继续南进，制造华北事父；而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反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华民族面临异常严重的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国的强烈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宣言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回内的舆论更加转向支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方向，并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 望。本案例说明，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能够顾全大局，及时制定符合民族利益的政策。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二节“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八一宣言》发布的历史背景及内容。

22、“一二·九”运动

（1）“一二·九”运动：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1935 年 12 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5 年 12 月初，北平各校学生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12 月 9 日，北平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有 30 多人被捕 ，数百人受伤。

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从 12 月 10 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16 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从 12 月 11 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 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在 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 支援学生斗争。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 月 12 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 280 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 月 27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 年 1 月 28 日，上海各界 救国联合会成立，在此前后，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 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海外侨胞和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团体，也通过发表宣言等形式，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这样，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也震撼了国内外。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

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2）案例

天津爱国学生一二一八抗日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为了支援和配合北平学生的行动，天津党组织迅速与北平学联取得了联系。天津法商学院学生朱光、庄林和南开大学王绶昌等立即到北平，秘密会见了北平学联和党组织负责人，商定在天津发动游行。12 月 17 日，天津各校学生自治会在北洋工学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 12 月 18 日发动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12 月 18 日 8 时，法商学院学生们高举抗日救亡的巨幅标语雄赳赳地跨出校门。学院教授、地下党员杨秀峰、温健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队伍行进途中，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师附中、扶轮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中山中学、觉民中学、工业学院的爱国学生相继汇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先在体育场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温健公等发表演讲，历数日本侵华罪行，痛斥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前往天津市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涌向天津市政府时，军警如临大敌，惊恐万状。各校学生推出代表向市政府请愿。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秘书长被迫接待了学生代表。请愿后，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唱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继续游行。游行队伍向着金钢桥前进。此时桥上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企图阻止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同军警展开说理斗争，高呼“欢迎爱国军警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感召下，一些军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游行队伍抓住时机，以男同学打头，女同学随后，向桥上冲去。游行队伍在官银号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校爱国学生队伍会合在一起。官银号前人声鼎沸，爱国激情像烈火一样在燃烧。青年学生们向周围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雷鸣般的口号声，激昂悲壮的救亡歌曲声，回荡在海河两岸。

下午 3 时，参加游行的 10 余所大中学校的 5000 多名学生在南开操场召开开全市学生大会，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并推选出负责人和主要联系人，从 19 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动员全市人民投入

抗日救亡运动。大会还发出宣言、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

——摘编自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

（3）案例分析

一二一八大游行，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回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嚣张气焰，表达了天津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极大地唤起了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天津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天津学生大游行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12 月 26 日，天津学联与北平学联成立“平津学生联合会”，寒假期间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北平学生南下，天津学生北上，会合于河北固安一代，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二节“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及其深远影响。

23、瓦窑堡会议

（1）瓦窑堡会议：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 月 27 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2）案例

策略转换

严冬,在茫茫的蒙古沙漠上,北风呼啸,雪花飞舞。一个身穿光板羊皮大衣,挑着货郎担的卖货郎正顶着寒冷的风雪,历时三个月,忍饥挨饿,在莽莽荒漠上艰难行走。他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此行回国,张浩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张浩原名林育英,1935 年 7 月,他作为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并在会议期间同王明等人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可以说,他对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是十分了解的。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他被中共代表团委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为了预防不测,张浩随身不能携带有关共产党的任何材料,他花了半个月的功夫,硬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的基本内容背诵下来,牢牢记在脑海里。1935 年 11 月下旬,张浩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回国之时,中共中央已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经过直罗

镇战役，红军在陕北也已站稳了脚跟。由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的爱国浪潮正席卷全国。各方面的形势都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制定完整的统一战线政策，来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因此，张浩的到来，不仅使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系重新接上，而且更重要的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和给中共中央的新指示。这对瓦窑堡会议能够扭转我们党的斗争策略，制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战的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地处陕北中北部，是一个大镇，里外 3 道城墙，约 2000 户人家。北距绥德 100 余公里，南距延安 90 多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可切断榆林至绥德至延安的交通线，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就将其作为落脚之地。

1935 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其他有关人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李维汉、郭洪涛等陆续来到张闻天所住的简陋的窑洞。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正式开始了。

瓦窑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政治形势和策略”以及“军事战略。”张闻天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和策略，作了主题报告。张浩凭记忆，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要精神。

从 12 月 17 日至 19 日，会议集中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与会代表最后统一了认识。

在 23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讨论中，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经过几个不眠的夜晚，一份体现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光辉文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被提交给会议，并于 25 日得到了会议的一致通过。

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决议特别强调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决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提出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

决议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决议还指出，必须为扩大和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因此必须克服在发展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同时大量培养干部。应当有数十万至数百万能够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只有这样，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摘编自葛丽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案例式专题教学教师用书》

（3）案例分析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央红军于 1935 年 10 月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即于 1935 年 11 月 13 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 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 11 月 28 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 月 9 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使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瓦窑堡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二节“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理解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24、西安事变

（1）西安事变：华北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国民党十七路军（西北军）做了大量工作。1936 年上半年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此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谏将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但不接受张、杨的正当要求，反而调集大批军队到西北“剿共”，并于 1936 年 12 月初亲自到西安督战，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如不愿“剿共”就要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正值张、杨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联共问题上矛盾尖锐之际，12 月 9 日，西安万余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 •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为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在 12 月 10 日、11 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于是决定对蒋进行“兵谏”。12 月 12 日凌晨，张、杨派兵扣押了蒋介石和他率领的南京政府官员，同时通电全国，申明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还提出了以停止内战和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八项主张，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极大反响。国际上，日本企图乘机扩大中国内战，支持在意大利养病的汪精卫迅速回国组建新政府。英美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力求和平解决，极力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当时苏联也认为，中国抗日，非蒋莫属，并希望中共出面和平解决。在国内，事变后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主张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城，妄图取代蒋介石。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并委派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营救蒋介石等事宜。西安各救亡团体数万人于 12 月 16 日举行集会，表示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要求严惩蒋介石。

张、杨发动事变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派代表速至西安共商解决事变的办法。中共中央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表示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于 16 日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谈判。同时，还派彭德怀、任弼时等率红军主力集中于潼关附近，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讨伐军”。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周恩来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商。张、杨完全接受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条件。23 日，周恩来会同张、

杨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两天谈判斗争，最终迫使蒋介石于24日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25日下午，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等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2）案例

“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据说，1985年12月25日，张学良85岁时看电影《西安事变》，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真实的场景，在张闾蘅这个与张学良最亲近的后辈还原中，张学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其实，对大伯来说，电影不能看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有青光眼，基本上是靠听的。看了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

那么，西安事变前夕的真实张学良到底是什么状态？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坦言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说：“我做那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假设我要自己的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在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没有向蒋要地盘和金钱，“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就原谅我”。

“不要打了！”在日本步步蚕食之下依然大举“剿共”，是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主要原因。为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曾与蒋介石大吵。

1990年，90岁的张学良回忆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说：“我真怒了，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1936年12月12日5时，西安事变爆发。

经多方斡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在12月25日下午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张学良亦随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是抱着必死之心去南京的。“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张闻蘅说：“蒋夫人（宋美龄）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不追究张的责任），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噩运。”

西安事变后极被幽禁，张学良时年36岁。他的幽禁生涯，从南京、贵州修

文县阳明洞、贵阳市麒麟洞、贵州开阳县刘育乡、贵州息烽县阳郎坝，重庆歌乐山戴公馆，直到台湾井上温泉。期间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张学良不无遗憾地认为：“我的事情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学良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1961年，张学良新居落成，位于台北市北投路70号。但搬入新居之后，张学良的出入依然有一群“服侍”相随。1994年，张学良夫妇离开台湾，在夏威夷定居，从此开始了真正自由的生活，直至去世。——张学良：从东北到台北 侄女张闾蘅讲述大伯往事，《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6月14日

（3）案例分析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张学良、杨虎城为何要“兵谏”劝蒋介石抗日？“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的真实心理和状态是全面了解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张学良西安事变后的幽禁生活，也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张闾蘅是张学良将军第五个弟弟张学森的女儿，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与张学良沟通的纽带之一。本案例通过张闾蘅回忆大伯张学良的往事，从张学良个人角度记述了西安事变发动的原因，也述说了张学良西安事变后的囚禁生涯，有助于学生更为全面地了解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

（4）教学建议

本案例可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二节“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部分的辅助教学，说明蒋介石面对日军的不断入侵，仍未全力抗击外敌反而不断派兵进攻陕北抗日的红军，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无奈“兵谏”、共产党全局出发的和平解决共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四、全国抗日战争时期

25、洛川会议

（1）洛川会议：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 23 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会议主要讨论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总结。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期间（8 月 23 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2）案例

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分析了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

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 1927 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讨论，基本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对游击战同运动战的主次关系有些不同的认识，会上，未充分交换意见。鉴于华北危急，虽然这时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会议仍然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前线。

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同争取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议还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国民党实行的只要政府及其军队参加、不要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由于存在着这种弱点，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党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这主要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

日救亡运动，推动桂系和川军等地方实力派拥蒋抗日；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保卫、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还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摘自《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卷，第四编《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第十三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3）案例分析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洛川会议高举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决定党要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党所领导的军队要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以充分发挥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二节“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洛川会议的重要性，理解洛川会议是中共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规定了中共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制定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

26、平型关大捷

（1）平型关大捷：1937 年月中旬，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 115 师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9 月 24 日夜，115 师以 3 个团的兵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等待来犯之敌。25 日 7 时许，日军板垣师团第 21 旅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共击毙日军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马车 200 余辆，缴获步枪 1000 余支，机枪 20 余挺，火炮 1 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2）案例

最漂亮的伏击战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度秋！”这是聂荣臻元帅在 86 岁高龄时写下的《忆平型关大捷》。1937 年 9 月中旬，沿平绥铁路西犯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后，以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向雁门关进攻。与此同时，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 5 师团，继续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协同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中国第 2 战区国民党军主力，打开晋北通路，实现右翼迂回，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歼灭平汉铁路沿线的中国第 1 战区国民党军主力。在日军的进攻下，第 2 战区第 6、第 7 集团军退守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内长城一线，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要求八路军先头部队尽快挺进晋东北协同其坚守内长城防线。为了配合第 2 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的攻势，八路军总部于 9 月中旬命令第 115 师进至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待机。第 115 师进至大营镇后，以第 343 旅前出至平型关东南上寨隐蔽集结，第 344 旅向上寨机动。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灵丘两县邻接处，为内长城重要关隘。9 月 20 日，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部，占领灵丘县城，并继续向平型关进犯。23 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 115 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相机侧击向该线进攻之敌。第 115

师受令后，决定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配合国民党军内长城的防御作战。师部率主力于当夜进至平型关以东冉庄、东长城村地域，并令独立团、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交通线，阻敌增援。24 日，林彪、聂荣臻组织营以上指挥员进行现地勘察，并确定“拦头、斩腰、断尾”的部署：第 343 旅第 685 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日军先头部队，并协同第 686 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的日军；第 343 旅第 686 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的日军；第 344 旅第 687 团占领西沟村至蔡家峪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丘和浑源方向来援的日军；第 344 旅第 688 团为预备队。为隐蔽行动企图，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各部队当晚冒雨进入阵地，并于 25 日拂晓前完成了战斗准备。25 日晨，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 时许，全部进入第 115 师设伏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第 115 师立即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并乘势将日军压迫于老爷庙至小寨村的狭谷之中。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我军英勇顽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退敌多次反扑，激战至 13 时许将被围日军全歼，战斗胜利结束。此战，第 115 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 1000 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 200 辆，缴获步兵炮 1 门、轻重机枪 20 余挺、步枪 1000 余支、军马 50 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 5 师团的进攻，支援了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摘自《永远的丰碑》第十四章《平型关战斗》。

（3）案例分析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国内一些人的“恐日病”和抗日“亡国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强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为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在开辟敌后根据地时，走到哪里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

迎，大批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鼓舞下，增强了斗志。在国际上，平型关大捷鼓舞了东南亚各国的爱国华侨，纷纷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成立援华组织，集合游行，抵制日货、拒绝出口钢铁给日本用来制造武器，声援中国抗战。骄横狂妄的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采取迂回进攻的策略，从而延缓了军事进攻的速度。上述种种，无不缘于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影响。

平型关大捷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战略思想。思想的统一，为日后共产党领导的各支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以结合地图和地理知识为学生讲解平型关大捷，在展现八路军指战员勇猛无畏的同时，以此经典战例来讲解山地游击战争在地利的辅助下所展现出的威力，进一步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出的强大作用。教师同时也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知晓 115 师此战的艰难不易以及重要意义。

27、《论持久战》的发表

（1）《论持久战》的发表：为了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 1938 年 5 月写了《论持久战》这篇重要论文。《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2）案例

指导抗战的不朽篇章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

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

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毛泽东传》（第二册），第二十章《指导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

（3）案例分析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1938 年 7 月 1 日，延安解放周刊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订本《解放》全文刊载《论持久战》，也受

到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冯玉祥在武汉创办三户印刷社时，便指示下面大量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并向后方蒋管区运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中国报导》上及时地用世界语节译了《论持久战》。受周恩来委托，宋庆龄找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语，在国际友人间和海外广泛传播。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亲自为英译本写了序，在序言中，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通过《论持久战》产生背景、重要作用和意义作为线索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路线方针。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抗战胜利做出卓越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根据中国国情实行了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受民众拥护的纲领与斗争策略。

28、皖南事变

（1）皖南事变：1940 年 10 月，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1941 年 1 月 4 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 9000 余人北移。6 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 7 个师 8 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经 7 昼夜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除 2000 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7 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于 1941 年 1 月 20 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 28 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1941 年 3 月 6 日，陷于孤立的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

（2）案例

喋血皖南

1940 年秋，国际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9 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方约定在世界战场上互为帮助、互相策应。日本为了加紧对太平洋上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实行军事进攻，抢夺战略资源，以实行其“南进”计划，迫切需要从中国战场上抽出军力。为此日本在德、意支持下，再次对蒋介石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在政治上极力拉拢蒋介石。而此时的英、美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急需阻止日军实行其“南进”策略，所以希望国民政府能够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军，最好能够让日军越陷越深。10 月 8 日，英国政府重新开放了已封锁 3 个月之久的滇缅公路，还给予蒋介石政府 1000 万英镑的贷款。而美国也宣布分三批给蒋介石政府 7500 万美元贷款，并宣布对日禁运废钢

铁、汽油等军事战略物资。德、意、日、英、美、苏都在拉拢蒋介石，蒋介石的信心一下子膨胀了许多，以前都是有求于诸列强，如今诸列强却来求助于自己。周恩来在给延安的回电中形象的给此时的蒋作了分析: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在这种背景之下，蒋介石决定制造第二次反共高潮，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0 年 10 月 19 日，国民党当局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电文中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皓电”发出之后，周恩来直接给新四军的叶挺、项英发去一电表示蒋、何逼我新四军渡江的决定决不会取消，要求新四军应当加紧渡江。延安方面指示刘少奇，要新四军不能再进攻韩德勤现驻地兴化，停止射阳以北地区的行动。

针对国民党发出的“皓电”，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中明确指示: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德日的劝与诱降以及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使国共两党火并，两败俱伤，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何应钦并击破之，顽固派要投降也比较困难。蒋介石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极大危险性，但他还在投降和加入英美集团、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就在这时，国民党当局又作了围歼新四军的部署。11 月 4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一个《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第三、第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 1941 年 1 月底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第五战区李宗仁所部，限于 1941 年 2 月底前，肃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12 月 18 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急电，即“齐电”，电文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新四军和八路军迅速执行军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悉数调往河北。蒋介石也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 12 月 31 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蒋介石之所以这么急于想消灭新四军，除了他所自认为的大好国际、国内局势外，还因为新四军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他的心头大患。新四军虽然在军队人数上不及八路军，但是所处地区为国民政府极为重视的华东地区。如今虽然是沦陷区，但是一旦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势必要还都南京，到那时蒋介石自然是不希望看见国民政府的首都处在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因此便对新四军痛下杀手。为了实现围歼新四军这一计划，蒋介石先后调集了 7 个师 8 万余人的兵力，调整了皖南指挥系统，选派上官云相为总指挥，统辖各路大军于 1941 年 1 月 3 日之前达到指定地点，修筑工事，以逸待劳，以绝对的优势面对即将到来毫无准备的新四军。

中共中央对于何、白的“皓电”高度重视，做了三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大力作反投降、反内战的宣传：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等地，通过种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希望用政治攻势来缓解国民党的军事攻势；一方面中共又以“佳电”作了让步的表示，“佳电”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朱、彭、叶、项正式致何、白的复电。电文措辞恳切而委婉，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4 年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及团结抗战之大计 6 个方面回顾了双方以往的纠纷，反驳了“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起诉”。但在防地问题上面，“佳电”同意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还连续电令项英，要他丢掉对国民党当局的任何幻想，下决心尽快北移。

12 月 24 日，毛泽东用命令的口吻电令项英等：你们必须准备于 12 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于 20 天内处理完毕，现在立即开始分批移动。虽然中共中央对于新四军领导人再三叮嘱，要求其迅速撤离，不可拖拖拉拉、犹豫不决。但是当时的领导人项英、袁国平等对国民党仍然抱有幻想，认为国民党不敢对新四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此没有意识到迅速北移的重要性。毛泽东见到电报后大为不满，于 12 月 26 日回电项英、袁国平，提出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依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不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

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受到了中共中央如此严厉的批评，项英等新四军领导才决定北移，可惜为时已晚，国民党方面早已经做好了军事部署，就等新四军进入陷阱了。1941 年 1 月 4 日晚，叶挺、项英奉命率领新四军军部、1 个教导团、1 个特务团和第 1 支队、第 2 支队、第 3 支队的两个团，共计 9000 余人，由泾县的云岭军部所在地出发绕道北上。在经过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事先埋伏、布置好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国民党军队共计 8 万余人。

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我新四军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虽然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在这次事变中，皖南新四军除约 2000 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为了挽救危局，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国民党 52 师进行谈判，却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虽然突出重围，但在泾县茂林赤坑山蜜蜂洞隐蔽时被原副官处副官、叛徒刘厚总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17 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指责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皖南事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参加抗日战争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只是制造该惨案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而是国共两党都尊奉为领袖的蒋介石，皖南事变的发生将原本就不太和谐的国共两党的关系推向了破裂的边缘。

——摘自《国共谈判六十年》第三章《皖南事变中的谈判》

（3）案例分析

皖南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动的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严重反共事件，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

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 6 个支队扩编为 7 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运用此案例说明国民党方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的态度也证明了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的方针。这次事件也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的孤立。

29、大生产运动

（1）大生产运动：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又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还制定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2）案例

南泥湾: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救保中央

“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一首《南泥湾》，让我们在重温抗战历史中再次感受到了前辈英烈们的崇高精神风范。在解放区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在我抗日军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没有坐以待毙，没有人心涣散，也没有向老百姓转嫁困难，而是选择了自己动手、走出困境。广大官兵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指示，走进新的战场，上至领袖、下至战士，无人特殊。毛泽东有自己种植的菜地，周恩来、朱德等还被评为“纺线能手”。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大生产运动中，最光辉的旗帜，当属南泥湾。当年，它只是一个位于延安东南面、没有人烟、荆棘丛生、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朱德首先发现了这里，尔后指示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旅长王震带领部队到此垦荒屯田。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激励下，指战员们披荆斩棘，艰苦奋战，实行

战斗、生产、学习三结合，战胜重重困难，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据统计，359 旅在南泥湾开垦耕种 30 多万亩土地，打了 1000 多孔窑洞，建起 600 多间平房，不仅逐步做到粮食、经费全部自给，而且在 1944 年向边区政府缴纳公粮一万担。部队不仅在物质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通过大练兵，军事素质和人员体质都有了显著提高，真正达到了兵强马壮。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南泥湾成绩的影响下，解放区大生产运动走向高潮，不仅基本解决了广大解放区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夺取抗战胜利、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最艰难的历史包含最丰富的养分。南泥湾，代表的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自救，而是升华为一种闪耀着普遍真理光芒的不朽精神，就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这种精神，强调的是“不计较客观条件”而努力奋斗、创造奇迹的强大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激励着党和军队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今天的中国，与抗战时期相比，已是沧桑巨变。综合国力的提升，已让我们这支军队不再面临缺衣少食的困境。军队的装备变了、待遇变了、服装变了、力量变了，但有一点是不能变的，就是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意志越是和平年代，越是安定环境，越需要保持这种精神状态，军事活动总是与牺牲相伴，与艰苦相随，一支军队如果片面追求舒适安逸，就会助长骄娇之气和虚华之风，影响战斗力的提升。一旦丢失这种精神，就会缺乏苦练精兵的担当，失去敢于亮剑的血性，能打仗、打胜仗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在雪域高原、戈壁大漠，狂大山深处、寂寥海岛，在挥汗如雨的训练场、刻苦攻关的实验室，今天的军人，尤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们铭记抗战历史，汲取精神养分，让伟大的“南泥湾精神”永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今天的我们收获革命前辈的坚定信念，凝聚起实现强军目标的强大智慧和力量，履行好新时期新的历史使命！

——摘自汤卫：《战士报》，2015 年 8 月 18 日第 4 版

（3）案例分析

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

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经过3年奋战，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和部分工商业；机关、学校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 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和群众同甘共苦。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到大生产运动起到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日的目的；缓解了军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同时，通过参加生产，提高劳动观念，增强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0、延安整风运动

（1）延安整风运动：1942 年到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目的是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整风运动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点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延安整风运动经过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全党整风的准备阶段，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第二阶段是全党普遍整风阶段，着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清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案例

“实事求是”熠熠生辉

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从 1942 年 2 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干部学习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现象，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和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理论和实践相分离，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的错误。报告科学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态度与学风。毛泽东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报告向全党提出了三点建议：（1）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从中得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2）聚集人才，分工合作，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历史。（3）干部教育应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 6 月 4 日，根据张闻天提出的计划，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二是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由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三是 8 月 1 日，中央印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此外，为了加强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究，1941 年 8 月 29 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集。9 月上旬，又决定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

1941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中央领导干部整风开始。毛泽东的报告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而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过去的路线，尽管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三个来源：一是党内“左”的传统；二是受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三是中国社会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四）指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办法。这次会议通过对过去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检讨，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认识前提。

九月会议后，为了推动整风学习，中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全党成立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参加的人员包括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区党

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各高级学校的某些教员。中央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组长、副组长及秘书的名单，均电告中央。各组先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阅读《“六大”以来》选编本，这样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正式开始。第二，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一是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二是复查错误路线下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由陈云、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五人组成。第三，改革教育。12 月 1 日，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成立研究组、学习组、文化补习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或政治常识、中国历史、中共党史或有关的现实知识。上述措施的贯彻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开展。

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当时题为《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2 月 8 日，毛泽东在宣传干部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基础上批判主观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

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他指出，在党内还存在一些学风不正、党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情况。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因此，“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还指出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关系，即：“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而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整顿学风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学风上的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二者相比教条主义更危险。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的指导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卤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毛泽东批评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党八股，指出它有八大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指出：“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改造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是从改造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开始的。（1）中宣部的整风。1942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提出了中宣部的三项任务：一是根据中央整顿三风的思想进行宣传指导；二是干部教育；三是国民教育。2 月 1 日，中宣部通知各级宣传部门“务必与整个党委的活动和工作密切联系和配合”，造成一种“活泼生动的与实际相联系的新作风”，将反对“三风”作为目前工作的中心，以极大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并以整风精神改造自己的工作。（2）改造党校。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党校的教育问题时强调：要学习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但过去孤立地研究，脱离实际。经过改造，党校面目一新，在全党整风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3）改造党报。从 1942 年 1 月下旬到 3 月上旬的一个半月中，中央政治局三次讨论报社的工作。中宣部发出了改造党报的通知。4 月 1 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一新，大大地扩充了陕甘宁和各根据地的报道篇幅，使党的声音成为战斗的强音，体现了党的喉舌作用。

4 月 3 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文件指出：整个运动要经过对文件的学习研究，联系本部门及每个干

部的工作，有领导地进行检查，然后作出正确的结论。各机关应用三个月时间(学校为两个月)精读指定的18个文件(后来增加为22个)，写心得笔记，领会贯通，然后拟定计划进行工作检查。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讨论中，要发展争论，不得抑制，但领导方面应善于注意把错误意见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不得将错误意见当作结论，讨论检查期间，可以出墙报，并设墙报委员会领导这项工作的开展。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还提议：延安各统整风检查由以下人员分工指导：中央直属机关系统，为康生、富春；军委直属系统为王稼祥、陈云；中央党校为毛泽东；各学校（军事学校除外）为何凯丰；陕甘宁边区系统为任弼时和高岗。

第二，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毛泽东邀请100多位文艺界人士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此，向大家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以及工作和学习问题。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与会人发言。5月23日是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大家继续发言后，朱德作了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的实践相结合，系统地论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问题。到1943年3月，文艺界整风学习基本结束。10月，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大家带头下乡。这次动员会后，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打起背包下乡演出。这是整风以后文艺界面向工农大众、深入生活的重大举措。几年后，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等。

第三，开展审干运动。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新的一年里，整风的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

由于当时正是国民党陕西省行政专员胡公冕和少将副师长侯声等预定抵达

延安之日。他们一行十余人，携带电台，准备在延安建立联络机关。3 月 23 日，中央书记处研究,认为国民党此举是对边区加强政治攻势的表现,决定由刘少奇、康生召集有关人员座谈研究防范措施。三天后，书记处决定，为防止暗藏的特务乘机活动，对确有证据的特务内奸或重大嫌疑分子，由社会部拟定名单，进行拘禁和监视，同时，对广大干部进行一次防奸教育。4 月 1 日晚，康生召集边区政府保安部人员，一夜间拘禁了 197 人，受监视的 140 人，在延安的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4 月 28 日，政治局决定：（1）成立反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2）五、六、七三个月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学习，日常工作由康生主持；（3）责成各机关首长亲自负责此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肃清内奸，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审查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

在 5 月至 7 月间,清查内奸工作使延安假坦白成风,干部人人自危,出现“抢救”高潮。7 月 30 日，毛泽东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并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危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三天后，政治局会议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一定要平反，要恢复弄错者的名誉。8 月 15 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此后，康生将“抢救运动”改称“自救运动”，错误的做法有所改变。8 月 15 日以后，审干运动从机关、学校发展成群众中的防奸运动，从延安逐步推向陕北各地。审干工作，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而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在这次工作中，也出现了反特务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1944 年 1 月 24 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电。指示发出后，反特务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得以制止和纠正。

第四，召开第二次“九月会议”和整风运动的结束。1943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第二次“九月会议”。会议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时开时停，直到 1944 年 5 月 21 日才结束全部议程。5 月 21 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会议主要是审查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的结论。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全会表决通过如下决议：（1）中央某

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有党外问题，根据有关材料，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2）1931 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为历史教训。（3）对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5）六次大会虽有缺点与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延安的整风运动也在空前团结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摘自《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册），第六章第三节《延安整风运动及意义》

（3）案例分析

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

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到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理解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31、土地改革运动

（1）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 2/3 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2）案例

土地改革：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

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两个月内派出一万二千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领导农民进行反奸清算、分配土地的斗争。不仅把大量原来被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霸占的“公有土地”以及汉奸的私有土地没收分配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而且进一步向地主阶级开展清算斗争，取得地主的土地。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原为日、伪、汉奸和地主占有的二千六百余万亩土地已经分配给贫苦农民。在某些地广人稀的地区，例如黑龙江的某些县，一户农民甚至可以分到将近十垧(每垧为十亩)土地。这就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

在苏皖、晋冀鲁豫、山东、冀东等解放区的边沿地区，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和土地改革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以自卫战争保护土地改革，又以土地改革支持自卫战争。农民有的一面打游击，一面在青纱帐里算账；有的白天打游击，晚上算账；有的轮流担任战争勤务，又轮流算账；有的男人参战，妇女算账。苏北南通某乡农民，一面手执武器坚决打击下乡抢掠的“还乡团”，

一面掀起三天三夜的清算运动，全体农民很快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尽管各地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的情况并不平衡，也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执行了《五四指示》，程度不等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解放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努力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增添牲畜农具，发展多种经营。解放区农村到处呈现一片积极发展生产的新气象。如东北解放区的北安县，过去耕种面积只有十九万垧，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后，耕种面积即扩大到三十八万垧，比过去增加了一倍。该解放区的克山县，土地改革后的耕种面积也由过去的一百五十八万垧增加为二百三十九万垧，增加了二分之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鸡泽县，农民在收回土地后，立即有三万六千五百余人组织起来，修浚了历史上长期为害的牛尾河、小允河，并开挖了二十三条灌溉渠道，不但使历年水患得以消除，而且使五万亩旱地变为水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开展，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做到了“耕三余一”，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又在物质上保证了革命战争的供应。内战全面爆发时，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下处于被分割和被封锁的状态，解放战争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一切需要。除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人外，其他所有消耗，包括部队的衣食住等多方面的物资供应，全部都要依靠就地解决。没有土地改革后广大翻身农民的大力支援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就无法解决解放战争的巨大消耗。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努力生产，并且千方百计地节衣缩食，不惜一切牺牲，全力支援革命战争。

——摘自《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分册）》第三节 《“五四指示”的深入贯彻执行》

（3）案例分析

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同时也削弱了富农阶级。没收或征收的土地、财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和部分下中农，使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占到总面积的 95%，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又通过土改后期的复查运动，对

错划成分的中农以及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偏向作了纠正，从而确立了政策界线，极大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争取和团结了中农。

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二节“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部分的辅助教学。教师可以通过此案例教学向学生阐释，农民对土地的热切要求和近代以来土地制度变革的几种设想，引导学生思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实现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可以向学生们介绍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变化，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32、中共七大

（1）中共七大：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迎来最后胜利的时刻，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确立抗战胜利后的路线、方针，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全国 121 万名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讲话，报告均围绕“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核心政治任务展开。大会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大会提出的军事战略是国民党应制止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改变消极抗日政策，以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要不断扩大解放区，收复一切失地，扩大人民武装，实现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迎接抗日大反攻；中共要有将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精神准备，准备夺取东北。大会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具体步骤是，当前先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再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2）案例

抗战胜利前夜的超长盛会

194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3 时，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穿着粗布上衣、圆口布鞋的毛泽东站了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当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一种是国

民党蒋介石集团所坚持的,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反共反人民,继续使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一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对此,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出来。”

结束开幕词时,毛泽东高声领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万岁!”代表们振臂响应,声震四方。

4 月 24 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会前发给代表。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并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摄影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之后的会议中,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为了指导大会顺利进行,在小组讨论期间,毛泽东经常参加各代表团和各小组的会议,非常注意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发现问题还做一些启发引导,让大家进一步思考。

中共七大共举行了 21 次全体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和小组多次召开会议,就各项报告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这些报告和决议案,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为夺取抗战胜利、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共七大开幕后,新华社即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公开报道,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庆祝,许多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向大会发去贺电、贺信,敬献贺幛、锦旗,延安的一些机关单位还向中共七大代表赠送纪念品。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共七大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像一声惊雷,引起强烈反响。沦陷区有的同胞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献,还被伪装成多种版本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广为流传。

——摘编自余玮:《中共七大:宝塔山下凯歌扬》,《中国档案报》2017年6月9日

(3)案例点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中共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大会,其作为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中共七大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还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4)教学建议

本案例可用作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部分的辅助教学。通过介绍中共七大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中共七大的重要意义,明确这次会议的最大贡献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33、重庆谈判

（1）重庆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关于国内和平问题的谈判。抗战结束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蒋介石的面前：国民党在接收日伪占领地区上不占上风。1945 年 8 月中旬开始，国共两党分别为迅速受降及抢占敌伪地区而全力以赴，甚至为争夺华北一些重要铁路和战略要地发生军事冲突。为了改变不利局面，蒋介石放出了和平手段。8 月 14 日、20 日、23 日，蒋介石连续给毛泽东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对战后中国政治前途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力争和平，反对内战，同时不抱幻想，不怕威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随时准备以自卫战争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接到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 月 28 日，毛泽东一行在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这次重庆谈判，名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判，两人有多次会见，并为谈判决定原则，但实际谈判中，中共派出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国共最高级别的重庆谈判进行了 40 天，但双方立场相距很远，围绕党派会议、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对日受降等问题，在谈判桌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改编两大关键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不承认解放区政权合法，并极力压缩中共军队改编的数量。双方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实际就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垄断国家一切权力，而中共坚持双方应平等协商，国民党应该尊重中共和其他党派的地位和参政权利。中共在谈判中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立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让步，如主动提议从南方八个地区撤出自己的军队，以显示诚意，争取民心，但在解放区政权和保持一定数量军队这些原则问题上，中共决不让步。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通称“双十协定”。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国民党邀请中共领袖前来谈判事实本身已说明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共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争取了舆论的支持和同情，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2）案例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

毛泽东同意前来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山城重庆顿时沸腾起来了。

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清早，飞机从延安东门外机场起飞。下午3时，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据《大公报》记者子冈报道：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9个人。

正当前来欢迎的各党各派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而各党各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形，立刻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的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能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张治中看到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8时从红岩乘车到桂园，下午6时从桂园回到红岩。他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鉴于过去的种种事实，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问题是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倾注了不少心血。在延安，他就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毛泽东登机前，他要警卫人员到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后来

自己又检查一遍。他交代警卫人员，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

在重庆，毛泽东外出时，周恩来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的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里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又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白天，他帮助毛泽东处理繁重的工作。深夜，当毛泽东休息后，他又继续召集会议，检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10 月 8 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三天，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到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而举行的鸡尾酒会。酒会后，在礼堂看戏。正在这时，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他是共产党员，是廖仲恺的女婿，在乘车外出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伤势严重，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副官赶来报告，周恩来听到消息后为之一震，但他没有立刻惊动毛泽东，只是对他轻轻说了声：“有点事，我出去一趟。”然后，立刻找来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同他一起赶到市民医院。这时李少石已因伤势太重而去世。周恩来流下了眼泪，悲痛地说：“二十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的岳父……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他责令张镇要严加侦察，缉凶归案。散会后，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用他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对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当时情况复杂，实际情况又未查清，周恩来虽满腔悲愤，但仍异常镇静。在场的《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回忆说：当周恩来把这一切安排妥帖后，“又轻轻地走进剧场，仍然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坐到京戏演完散场，毛主席向主人道别上车为止。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同志不曾将这个当时尚未查清而又非常震撼人心，也使他本人悲愤欲绝的的惨案向毛主席透露一个字。毛主席始终坐

着看戏，不知道曾经发生这个大事故。”“周恩来同志在场内场外显然成为两个人，如果这不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和出于对毛泽东主席安全的赤诚关怀，怎么能够当场如此镇静呢？”

由于环境十分险恶，事实真相又不明，当晚在办事处开会研究时，气氛异常紧张。参加会议的人感情激动，义愤填膺，作了种种猜测，都把它同毛泽东的安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国民党下的手！只有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说：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事情发生后我们的司机（这是一个临时雇来的司机）就自己跑了？他说后，许多人批评他警惕性不高。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有道理！于是，那个年轻人又接着说下去：在我们四川有时司机开车很快，不小心把国民党士兵碰了，喊停不停，士兵就举枪打，会不会是这个缘故？周恩来听后，严肃地说：这有点道理，要研究一下。事后经过调查，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汽车回城时，司机开快车，撞伤在路边的一名国民党士兵。班长见汽车肇事后没有停下来，就朝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的工具箱穿过，打中李少石的肺部。李少石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去世。事情弄清后，《新华日报》在11日发表钱之光的谈话，说明这个悲痛的偶然事件的经过，并表示愿担负那个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万一伤重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周恩来在安葬李少石后，也亲往医院看望那个受伤士兵，重申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以后，周恩来多次说过：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这件事的处理，又使人看到周恩来那种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品格。

《双十会谈纪要》签字的下一天，也就是十月十一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进行谈判。

——摘编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988页

（3）案例点评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重要交涉事件。抗战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国家要统一，人民要和平。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做出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既定的，谈判不过为障人眼目和争取时间。对此洞若观火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谈判桌上以必要的让步，

力争最有利的成果。而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问题则是这一重大事件的并非不重要的细节之一。这个案例记述了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做了大量严格细致的工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见掩盖的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一节“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部分的辅助教学，帮助学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所做的努力。

34、三大战役

（1）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是指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前后历时 4 个月零 19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154 万余人。加上 1948 年 7 月至 1949 年 1 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 230 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2）案例

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

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结束后，黄维、杨伯涛等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的将领们被解放军俘虏，从战场押送到后方的临涣集。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回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过屠门而大嚼。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杨伯涛所见的场面，只是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一个缩影。人民解放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和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作战行动越来越频繁，战役规模越来越大，对后勤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一个战役打起来，前方对民工、担架需求很大，弹药、粮食、菜蔬、伤员、鞋袜等都要运输。陈毅高度评价山东解放区群众对华野作战的支持：用落后的农村工具来供应现代化大兵团作战，这是自卫战争中最伟大的一面。

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在酝酿淮海战役计划时，充分考虑到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性。淮海战役的规模有多大，事先谁也没有准确的估计。11 月 16 日战役开始后，毛泽东给中野、华野负责人的电报说：“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根据华东局和华野的部署，淮海战役的后勤和支前工作的分工是：前方由华野后勤部负责，后勤部部长刘瑞龙随华野指挥部行动，负责掌握部队的情况和需求，对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进行接收、调度和分配。后方由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傅秋涛为主任，负责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组织民工和车辆、船只运送到前方兵站。为转运伤员，华东支前委员会组织了 4 条转运干线。隔 30 里设一小站，60 里设一大站。每个纵队配备随军担架 500 副，每副配民工 5 人。还有机动担架 7500 副以供急需。各县都在交通要道上设立民站，供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编组往来休息。民工根据任务不同分为三种：一线随军常备民工，每期 3 个月；二线转运民工，每期 1 到 3 个月；后方临时民工，每期 1 个月。民工以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为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淮海战役发起后，随着华野主力的南下，后方 7 条运输干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像 7 条大血管向前方输送物资。

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推着小车运送粮食的民工大军。从后方到前方，从乡村到城镇，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都为支前作贡献。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日夜活跃在战场上。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 543 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 22 万人，二线转运民工 130 万人，后方临时民工 391 万人），担架 20.6 万副，大小车辆 88.1 万辆，挑子 30.5 万副，牲畜 76.7 万头，船 8539 只，汽车 257 辆，向前线运送弹药 1460 万斤，筹运粮食 9.6 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 11 万余名，有力地保障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随着战线不断南移，民工也随着部队越走越远。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的小车队是模范的典型。他用的一根竹棍，上面刻着他们支前 5 个月内经过的路线：从家乡山东胶东区的莱东县陶障区（今莱阳万第镇）出发，经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直到濉溪口。跨越三省 88 个城镇和村庄。他们跋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的是高粱米、萝卜干，车上的白面、小米一点

不动，留给前线战士们吃。这支小竹棍，拉车时拄着它走路，过河时用它探路，它不仅为支前作出了贡献，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苏北地区小车队支前，正是寒冬腊月。白天有国民党飞机轰炸，民工都是夜里运输。每天太阳落山，一队队的小车就行进在条条公路上。小车上的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星星点点，一望无际，非常壮观。“华中第五专区的民工，经过700里的长途运送一批大米到前方，他们的任务是将大米运到宿迁，当这批大米运到时部队西开了，要他们再运到睢宁。他们运到睢宁时，部队又西开了，他们就尾随部队到了符离集，最后运到濉溪口，长途行程700里才完成任务回去”。民工支前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三纵炮兵团与渤海民工一团并肩战斗，互相关照。“有时，部队和民工住在一个村子里，部队主动让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却在露天搭棚子睡；前方做饭缺锅，部队就让民工先做；天冷，有些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发给民工。部队还派人教民工防空防炮，指导他们挖防空壕，一到住地又主动检查民工防空设施”。

人民的支援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野司令部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中指出：“这次作战中的物质供应，是达到较完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与医术救济诸方面，都未感受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的完满胜利，是不能设想的。”1951年2月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海战役证实了这个真理。

——摘编自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3）案例点评

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起，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最后推翻蒋家王朝，夺取全国胜利而精心组织的战略决战，也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堪称决战中的决战。

淮海战役以其以少胜多而被载入世界经典战例史册，共产党以60万部队加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支援，战胜了装备优于自己的80万国民党精兵。凡此巨大战

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在淮海战役过程中，人民群众支援前方作战的规模之巨大，后方勤务任务之繁重，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在整个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和华北等区人民，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送粮食，运弹药，抬担架，救伤员，做了难以计数的保障工作，真是旷古未见的人民战争的伟大画卷。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证实了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个真理。即使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在强烈的对照下，也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

如流的推车，如林的担架，见证了当年亿万人民是如何自觉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背负肩挑，牵马推车，运送各种物资，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前线作战。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蒋介石的军队最终土崩瓦解；有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千万辆推车就推出了一个人民的新中国。

（4）教学建议

本案例可用作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四节“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部分的辅助教学。通过介绍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前线作战的感人事迹，帮助同学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以及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引导学生认识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35、七届二中全会

（1）七届二中全会：中共在全国解放前夕在根据地召开的最后一次制定全国解放后各项政策的重要会议。1949 年 3 月 5 日—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应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阐明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全会认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形势，号召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案例

毛泽东：“进京赶考”——我们不当李自成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办公地点将在全会后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即北京。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

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全会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 11 辆吉普车和 10 辆美制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两年前的 1947 年 3 月 18 日，面对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进攻，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战斗和工作了 10 余年的延安，转战陕北，指挥人民解放战争。1948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进入华北，于 5 月 27 日移驻西柏坡。离开延安仅仅两年，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就要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了。

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就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

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临行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取得政权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结果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格外重视。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即指示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一再强调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

毛泽东率领的车队出了西柏坡，进入华北大平原。行军途中，毛泽东很高兴，他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没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当天，车队在河北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这一夜他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开进，中午到保定休息吃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军部。3 月 25 日清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乘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北平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以及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著名民主人士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进驻香山。毛泽东住进香山的双清别墅，半年后的 9 月 21 日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

——摘编自《陕西日报》，2006 年 9 月 30 日

（3）案例点评

本案例介绍了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党内外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贪污腐化问题十分重视，多次以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告诫党员干部。1944 年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文中记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原因。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从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李自成之所以成功，是他依靠农民群众，顺乎人心的结果；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骄傲，因为腐化，从而失去人心。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即将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全党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向城市，总任务将由革命转变为建设，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怎样适应这种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为此，党的领导人提出并阐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尤为关注的问题。解放区的反腐倡廉斗争与国统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民心所向胜过雄兵百万。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的“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今天对于全党、全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在一些领导干部当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骄傲自满、贪污腐化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前我们仍要铭记“进京赶考”命题，不忘执政初心，加强执政党建设，走好新时期的“赶考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4）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四节“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部分的辅助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36、渡江战役

（1）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目标的进军南京的一次伟大战役。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20 日晚，谭震林指挥的渡江中集团在安徽芜湖至枞阳段江面胜利越过长江天险，踏上了江南的土地。次日，毛泽东、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为目标的人民解放战争辉煌的大进军就此展开。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是在长达千里的苏皖长江沿线进行的。其中，粟裕指挥的东集团在江苏江阴至扬中段渡江，随即截断沪宁路。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在安徽枞阳至望江段渡江，兵锋直指浙赣路。解放军渡江作战，依靠的是成千民工驾驶的小木船，但兵锋所至，势如破竹，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的国民党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阻击或反击，相反，驻守江阴要塞的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相继宣布起义，对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是一重大打击。

（2）案例

颜红英：我送亲人过大江

渡江战役中，广大船工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无数船工更是贡献了自己唯一的船只，船家女颜红英就是其中的代表。

渡江战役前夕，颜红英驾驶满载解放军战士的船只在江都河口附近夹江里进行渡江演习时，遭遇国民党军舰炮火袭击，弹片擦破脸颊，她的脸上因此留下了伤痕，耳膜也被震伤，听力下降。受伤后，颜红英和父亲、妹妹依然踊跃参加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1949 年 4 月 22 日，长江江面上，一位身材瘦小、梳着大辫子的姑娘奋力摇橹，好让船上的解放军战士尽快登陆，到对岸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另一位姑娘半蹲在船舱内，她们的父亲在后面掌舵。就在那姑娘奋力划桨驶出港口时，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健东在江岸上抓拍到了这一幕。照片洗印出来后，以《我送亲人过大江》为题，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后来，颜红英在接受采访时，指着脸颊上的伤痕回忆说：“那天（1949 年 4 月 22 日），大军要到江南去了，我家的船上坐了 24 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南边（国民党军）向我们打炮，厉害呐！有一名战士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怕什么！我要把你们送过江，解放全中国。’我划着船驶向江心时，突然一颗炮弹就在我家船边不远处爆炸了，一块东西（弹片）擦破我的脸颊，顿时满脸是血，我

也不管，还是拼命地划，一心想尽快把人民解放军战士送过江，到前方打胜仗。”

邹健东老人表示，多少年过去了，他还是不能忘记渡江战役中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场面和划船小姑娘纤弱的身影，他深情地回忆说：“当年如果不是这些船工奋不顾身地支援前线，百万大军是过不了长江的，人民的功绩是不能忘记的。”

——摘编自宗旸、陈悦：《我送亲人过大江——亲历者忆渡江战役》，《炎黄春秋》2019 年第 4 期

（3）案例点评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是敌我双方最后一次主力会战，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以农村为中心向以城市为中心转折的标志性战役，以我军消灭国民党军江南最大的最有组织的精锐部队，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攻克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而胜利结束。它彻底粉碎了敌人划江而治的企图，为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有利条件。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时十分感慨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渡江战役中，人民群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依靠人民，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无往而不胜背后最磅礴的力量。渡江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献身精神，也展现了人民群众英勇支前、浴血奋战所进行的努力。

（4）教学建议

本案例可用作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四节“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部分的辅助教学。通过介绍在渡江战役中人民群众英勇支前的历史，引导学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的力量之源。

3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法理基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为建国的指导原则；随后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30 日，全体会议上选举出 180 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 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政协于 9 月 30 日闭幕，从而在法理上最后完成了建国的准备工作。

（2）案例

平等协商定国是

1948 年，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人民政权组建在即。全中国、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共产党将组建一个怎样的政权？

对于新政权该怎么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有准备。在 1945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设计了实现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为商讨召开新政协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仔细考虑如何把各地的民主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来。

随后几个月，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下，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马叙伦、郭沫若等大批民主人士，克服重重险阻，分 3 批由香港北上，到达解放区。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不久，随着国共北平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新政协筹备工作迅速提上日程。

1949 年 6 月 15 日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出席者有 23 个单位的 134 位代表，“党员 43 人，进步人士 48 人，中间人士

43 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 16 人，在进步人士中有 15 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筹备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经过近 3 个月的艰苦研究、协商，最终确定了 662 位代表名单。其中，共产党员约占 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 26%，各民主党派代表 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 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达总数的 2/3。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毛泽东看后曾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在 662 人的宏大阵容中，“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 1924 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 92 岁的老翁，也有 21 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空前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49 年 9 月 21 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包括各党派、团体代表 634 人和来宾 300 人。当毛泽东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会场里，所有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9 月 25 日晚 8 点，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田汉、梁思成等 18 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就在大家陷入沉思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打破了沉默：“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周恩来闻言，立即表示支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经商议，大多数

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他的话音刚落，屋内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丰泽园里随即传出洪亮而激昂的歌声。

9 月 27 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 1949 年。三、中华人民共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 月 30 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 180 人当选;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6 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 63 人为政府委员；讨论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

10 月 1 日下午 3 点，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随后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摘编自吴志菲：《领袖建国的真实故事》，载《环球人物》2009 年第 24 期

（3）案例点评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历史已经走过了 60 多年。回首当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拟定新中国的“建国纲领”的过程，既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精神，也反映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平等协商国家大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为国献策，开创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庄严宣告，中国人终于从 100 余年的屈辱中站立起来，犹如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开始了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历史。

（4）教学建议

本案例可用作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四节“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部分的辅助教学。通过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主要内容，帮助学生了解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明确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38、开国大典

（1）开国大典：1949 年 10 月 1 日 15：00 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举行的仪式，直到 21：00 才结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2）案例

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但其背后曾有艰辛与波折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这一伟大历史时刻，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夕，国庆筹备小组加紧了整修天安门，尤其是修建国旗杆的工作。建筑工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刻苦攻关，全身心投入国旗杆的修建工作。早在 1949 年 8 月 9 日至 14 日，在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就作出了迎接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旗杆。赵鹏飞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周密计划思考，他对整个工程进行了具体的分工。将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交由建筑局建筑师钟汉雄负责，旗杆的结构设计则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来完成。

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达到同等高度。经过一番实地的测量，林治远得出的数据为 35 米高。按理说 35 米并不是很高，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在当时确实条件极其有限，刚刚解放的北京，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林治远想方设法到处奔波打听，最后了解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的情况。为此，他立刻亲自奔赴市自来水公司，精心选用了 4 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可是，焊接完之后，一量长度却才够 22.5 米，达不到 35 米高的要求。情急之下，林治远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如实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因地制宜灵活对待。最终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由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对旗杆制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大家分头开始制作。

开国大典的升旗问题到底怎样解决为好，不能让毛主席走下天安门，也不能别人替他代升。怎么办？最后还是想出用电钮升旗的点子。旗杆制作开工后不久，国庆筹备小组领导同志来到现场检查工作并且明确提出：“升旗要自动的，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旗就更好了，更有政治意义！”这个意见立即付诸实施。

自动升旗方案还是由林治远来具体落实，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林治远接到任务之后，与有关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自动升降的开关设施。他们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以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且自动断电。为了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而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才于 9 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至此，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高高地竖立于天安门广场上。

1949 年 9 月 30 日，电钮安好后，为了确保第二天升旗仪式真正做到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又在晚间认真地做了最后一次试验。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运行正常的升降开关，在进行预演的这关键时刻却出了故障。开始时，他们以一块红布代旗，安装好以后，按动升降开关按钮，这块红布徐徐地向上升起，但当红布升到旗杆顶部以后，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把这块大红布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经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这一突发事故搞得大家抓耳挠腮，一时没了主意，忧心如焚。此时，天安门南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奠了基，有人说这面旗子有灵气，它以半旗向为国捐躯的英灵致了哀。

有关负责人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看完现场，弄清故障原因之后，就迅速与消防队联系，请消防队火速增援。消防队运来了云梯，升起后仍然差几米够到旗杆顶。见此情景，赵鹏飞又找来能够熟练搭棚彩的兄弟两人。兄弟俩来到旗杆下，毫不犹豫地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那块大红布取了下来。此时，总指挥聂荣臻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对故障进行了分析，

并责成有关人员检查时一定要细致，每个环节都不能有疏漏。故障排除以后，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对每一部位、每一个环节又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修理。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为了防止意外，工程指挥部还是特意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准备万一毛泽东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端还不停下来，便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切断电源。

与此同时，为保证不耽误升旗仪式，国旗的缝制必须加紧。直接负责承办缝制国旗任务的是宋树信。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29日上午，经理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缝制一面开国大典上用的长5米、宽3米多的特大五星红旗。宋树信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位于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他们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黄缎子。宋树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细看就看不出来。

根据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9月30日下午，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主席面前。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林治远奉命站在毛主席身旁协助升旗。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林治远经工作人员指点，把三脚架放在毛主席将要站立的地方。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陆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3点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听到“请毛主席升国旗”后，便从容不迫地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指挥百万雄师的巨手有力地按动了电钮。只见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天安门上空，被蓝天搂在怀里，定格在白色铁杆上，在新中国的首都上空鲜红耀眼地迎风高高飘扬着。

——摘自：李虹：《开国大典若干“第一”逸事》，《党史天地》2009年

10 月 15 日

（3）案例点评

开国大典是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举行的仪式，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定 10 月 1 日为国庆节。主持仪式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尚与中华民国政府维持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并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仪式，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代表，工人、农民、市民、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城防部队等约三十万人。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 20 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4）教学建议

本案例可用于下篇综述“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部分的辅助教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予以介绍，让同学理解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